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六本 第三分

(抽印本)

清朝入關以前
滿洲、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between Manchuria, Korea,
and Japan before the Qing Conquest of China

孔令偉

Ling-Wei Kung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96, Part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2025

清朝入關以前 滿洲、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

孔令偉*

自十六世紀後期建州女真興起，至 1616 年努爾哈齊建立金國政權，當時業已對日本有所認識。1592 年壬辰倭亂前後，女真人曾根據自朝鮮、明朝方面探得有關日本之資訊，從事相應之對外活動，尤其關注當時日本自歐洲習得改良之火砲技術。1619 年薩爾滸之役後，金國更是從朝鮮降人處獲知大坂之役後德川氏消滅豐臣氏之政治變化，並留意到日本武力隔海介入朝鮮半島之潛在可能。皇太極主政之天聰年間，由於滿洲、朝鮮、明朝等多方角力所導致東北亞複雜之地緣政治，女真／滿洲人更是積極通過情報搜集偵探朝鮮「請兵於倭」相關資訊，進而得知德川幕府與明朝勢力往來之動態，並將「倭子」與「倭子海」等日本相關地理資訊以滿文標注在地圖中。至崇德年間清朝正式龍興關外，對於日本資訊的探求更是日趨頻繁。1637 年丁丑約條簽訂，朝鮮成為清朝藩屬後，皇太極在明朝對滿洲實施經濟制裁的背景下，屢屢派員要求朝鮮引導對馬藩使者從釜山前往盛京，以期通過與日本建立通商關係獲得倭劍與東南亞香料。朝鮮最初對於清朝提出通信日本的要求，抱持消極態度；然 1638 年日本與朝鮮關係的惡化，促成朝鮮主動向清廷寄送倭情咨文。在此歷史脈絡下，有關日本的資訊曾被轉譯為滿文，並經由身處藩館的朝鮮昭顯世子加以解說，清朝因此得以在十七世紀前期接收關於島原之亂、柳川一件等江戶日本重大事件之情報，並對日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進行廣泛求索，尤其關注天皇及幕府將軍等政治制度，乃至明朝與日本經由長崎貿易進行交通。這些多元的資訊來源，形成入關以前滿洲人對日本的認識基礎，與清朝在東北亞的疆域擴張息息相關，亦為其入關後的海洋認識奠定基礎。

關鍵詞：滿文檔案 明清中國 江戶日本 朝鮮韓國 資訊流通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國科會計畫（編號 NSTC 111-2410-H-001-005-MY3）研究成果。

一・前言

在歐亞大陸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除以定居為主的農耕文明之外，內陸亞洲（Inner Asia）與海洋世界（the maritime world）的移動人群亦曾對跨地區間的資訊流通與文化交流發揮關鍵作用。內亞與海洋彼此間不僅並非割裂而互不相干的獨立體系，與之相反，二者間實際上具有緊密的互動往來，其中自中古以降活躍於東北亞的女真人，即為顯著的歷史事例。世居於大興安嶺以東的松遼平原乃至黑龍江下游的濱海地區，身處在內陸亞洲及季風亞洲（Monsoon Asia）交界帶的女真人，自十一世紀以後便發展出多元的經濟活動，他們不僅是嫺熟漁獵採集，獨特的自然環境亦使其得以發展出兼營農牧的生產形態，¹ 故《金史》載女真先祖從「夏則出隨水草以居」的遊牧採集發展出「耕墾樹藝」等農作活動，²《三朝北盟會編》則稱其「便於牧放，自在散居」。³ 除耕牛牧馬之外，濱海的女真人亦善舟船之利，在十至十三世紀間，女真人曾經由黑龍江下游以及朝鮮半島航行日本海與鄂霍次克海進行海上貿易，從而與日本發生接觸。⁴ 日本寬仁三年（1019）東海女真更曾集結成海盜集團，劫掠日本國西方的壹岐島、對馬島以及九州諸地，史稱「刀伊入寇」。⁵ 十三世紀初期在金朝屢次敗於蒙古並放棄中都的情況下，金貞祐三年（1215）女真將領蒲鮮萬奴（?-1233）自立於遼東，號大

¹ 劉浦江，〈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246-253。

² 脫脫等纂，《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卷1，頁3。

³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清許涵度刻本影印），卷20，頁146a。

⁴ 井黑忍，〈女真的形成——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諸集團の興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編，《金（女真）と宋：12世紀ユーラシア東方の民族・軍事・外交》（東京：研文出版，2021），頁109-169；養島榮紀，〈史料からみた靺鞨・渤海・女真と日本列島〉，天野哲也、白杵勲、菊池俊彦編，《北方世界の交流と変容：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日本列島》（東京：山川出版社，2006），頁76-99；中村和之，〈金・元・明朝の北東アジア政策と日本列島〉，天野哲也、白杵勲、菊池俊彦編，《北方世界の交流と変容：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日本列島》，頁100-121。

⁵ 池内宏，《刀伊の入寇及び元寇》（東京：岩波書店，1934）；関幸彦，《刀伊の入寇：平安時代、最大の対外危機》（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21）。諸如藍文徵、錢穆等近代中國史學者，亦曾輾轉經由日本史二手研究關注十一世紀女真人攻打日本的歷史事件，參：游逸飛，〈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史原》復刊3（2012）：197-212。

真國，並曾在海參崴等毗鄰日本海處建築城池，作為沿海貿易據點。⁶ 其後大真國雖為蒙古帝國所攻滅，但長於舟師的女真人並未消失在歷史舞台上，反而隨著蒙元的擴張而持續活躍於東亞海域。至元十一年（1274）、十八年（1281）蒙古帝國在大汗忽必烈（1260-1294 在位）的主導下聯合高麗對日本發動兩次海戰，即日本史家稱「蒙古襲來」，⁷ 對此《元史》、《高麗史》等史籍亦曾記述女真人在蒙元水師中扮演關鍵角色。⁸ 由此可見，十一至十三世紀的女真人不僅曾馳騁內亞草原，亦曾破浪東亞海域，而在海上活動的過程中，他們曾經與隔海的日本發生接觸。十六世紀後期女真／滿洲人再次崛起，在拓展其武裝勢力的同時，亦積極發展跨域商貿網絡；⁹ 在此歷史背景下，一衣帶水的日本又再度進入其視野當中。隨著十七世紀前期清朝的建立與擴張，滿洲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乃至彼此認知，對於近世東北亞的歷史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清朝與日本間的資訊交流渠道，複雜而多元。眾所周知，清朝入關以後通過中國東南沿海與長崎貿易網絡，和日本發生密切互動。¹⁰ 另一方面，自十七世紀

⁶ 中澤寛將，〈ロシア沿海地方の女真遺跡〉，古松崇志等編，《金・女真的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東京：勉誠出版，2019），頁 234-240。

⁷ 相田二郎，《蒙古襲来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58）；Judith Vitale,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Mongol Invasions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4)。

⁸ 《元史》：「將屯田軍及女真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又《高麗史》：「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合浦，以待女真軍。女真後期乃發船入對馬島，擊殺甚衆。」宋濂等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8，頁 154；鄭麟趾等纂，《高麗史》（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卷 104，頁 11。

⁹ 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舎出版，1992）。按：本文以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改諸申（滿文 jušen，女真異名）為滿洲（manju）為界，此前稱「女真」，其後稱「滿洲」；橫跨 1635 年時限的情況，則以「滿洲」作為族群總稱。至於金國（aisin gurun）與清朝（daicing gurun）之斷代，則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極立國號大清為基準，不待順治元年（1644）清軍入關。關於皇太極改諸申為滿洲之原委，參：黃彰健，〈滿洲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 下（1967）：459-473。

¹⁰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1967）；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品数量一覽，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1987）；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2009）。

後期滿洲與日本雙方分別通過賞烏林與山丹貿易，促成黑龍江流域、庫頁島及日本松前藩（今北海道松前郡）間的交通往來，¹¹ 清朝也因此經由十八世紀庫頁島調查而聽聞愛伊努人呼為「西散大國」的日本情報。¹²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東南沿海—長崎、黑龍江下游—庫頁島—松前藩等路線外，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滿洲曾通過朝鮮釜山和對馬藩（今長崎縣對馬市）的交通關係，與江戶幕府相互打探彼此消息。¹³ 本文由聚焦清朝入關以前對日本的認知起源入手，將滿洲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放置在跨地域、跨文化的歷史脈絡中，通過爬梳滿、漢、朝、日各方書寫之多語種史料，並兼容參考與對話明清史、滿洲史、日朝關係史、東亞海域史等先行研究取徑，進而關注由滿洲、朝鮮、日本三方乃至漢人軍閥及商販等多元族群，往來瀋陽、皮島、義州、漢陽、釜山、對馬島、江戶之間所共築的東亞資訊網絡，重新檢視滿洲、朝鮮、中原與日本間的地緣政治互動，藉此開展東亞史、內亞史及海洋史的宏觀比較視野，以期從跨域角度為溝通中國史、內亞史、朝鮮史及日本史等史學領域提供基礎。

本文探討清朝入關以前滿洲、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主要涉及清朝與滿洲史，中日朝關係史乃至近世東亞海域史等領域之先行研究。本文在參考學界既有成果基礎之上，進一步發掘滿漢文檔案史料，並從跨域（border-crossing）視野重新檢視滿洲與朝鮮、日本等東北亞周邊勢力之資訊流通，以下對相關先行研究進行扼要述評。現代學術意義的清朝入關前史，發軔於二十世紀初期的日本東洋史學界，作為該領域開拓者的內藤湖南（1866-1934），曾將清朝入關前之史料根據書寫性質總結為三類：一、成於清人自身手筆者；二、成於明人之手者；三、成於朝鮮、日本及其他外國人之手者。¹⁴ 換言之，在參考明朝文獻的同時，更要能運用清朝、朝鮮、日本等東亞各地之多元史料，內藤尤其強調朝鮮史料對於治

¹¹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谷本晃久，《近世蝦夷地在地社会の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20）。

¹² 松浦茂，《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頁 105-106；遼寧省檔案館譯編，《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1984），頁 132；池上二良，〈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北方文化研究》3（1968）：179-196；孔令偉，〈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成大歷史學報》66（2024）：55-81。

¹³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史林》19.2（1934）：24-48；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史林》19.3（1934）：122-146。

¹⁴ 內藤湖南，〈清朝開國期の史料〉，神田喜一郎、內藤乾吉編，《內藤湖南全集（第七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 321。

早期滿洲史之關鍵意義，故其刊印《滿蒙叢書》時特意收錄記述昭顯世子（1612-1645）於盛京為質期間的《瀋陽日記》。¹⁵ 由於清朝入關以前的漢文史料相對零散，加諸當時相關滿文檔案尚未經系統發掘刊布，朝鮮史料中又保存關於早期滿洲人的豐富記載，其中多有不見於明朝史籍者，故內藤主張研究清朝入關前史須善用朝鮮史料，此主張在二十世紀 20 年代為孟森（1868-1938）等中國學人所容受並認可，¹⁶ 遂成為後世清史學界之共識。

內藤最初由史料學出發的主張，爾後經由稻葉岩吉（1876-1940）等人的倡議與實踐，¹⁷ 在日本東洋史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並隨著十九末至二十世紀前期日本帝國推行大陸政策的特殊背景下，進一步形成強調所謂「滿鮮一體」的滿鮮史觀。¹⁸ 在此學術思潮下，日本東洋史學界出現一批擅長結合滿洲與朝鮮史料治明清之際東北亞史的學人，其中池內宏（1878-1952）、和田清（1890-1963）、園田一龜（1894-1962）、今西春秋（1907-1979）、三田村泰助（1909-1989）、田中克己（1911-1992）等人，對深化清朝入關前的政治史、社會史等相關議題均有建樹。¹⁹ 在滿鮮史的研究框架下並結合自身對日本國史的關懷，以浦廉一（1895-1957）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 1934 年首先留意到明末清初之際日本在朝鮮與

¹⁵ 《瀋陽日記》（收入內藤虎次郎編，《滿蒙叢書》第 9 卷，東京：滿蒙叢書刊行會，1921）。

¹⁶ 吳政緯，〈「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明代研究》33（2019）：155-198。

¹⁷ 稻葉岩吉，《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14），共 2 冊；稻葉岩吉，《朝鮮文化史研究》（東京：雄山閣，1921）；稻葉岩吉，《光海君時代の滿鮮關係》（京城府：大阪屋號書店，1933）。

¹⁸ 白鳥庫吉，〈滿鮮史研究の三十年〉，《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71），第 10 卷，頁 403-407；稻葉岩吉，〈滿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東洋》25.5（1922）：25-33。關於滿鮮史的學術回顧，參：東方學會編，《東方學回想》（東京：刀水書房，2000），第 1 卷；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2003）：1-45；林志宏，〈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7（2015）：1-50；蔡長廷，〈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6）。

¹⁹ 池內宏，《滿鮮史研究・近世篇》（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2）；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滿洲篇》（東京：東洋文庫，1955）；園田一龜，《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東京：國立書院，1948）；園田一龜，《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續篇》（東京：東洋文庫，1953）；今西春秋譯，《滿和對譯滿洲實錄》（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36）；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65）；田中克己，〈清鮮間の兀良哈（フルカ）問題〉，《史苑》20.2（1959）：28-41。

滿洲地緣政治間所扮演的特殊角色。²⁰ 浦廉一主要通過梳理《朝鮮王朝實錄》及朝鮮士人文集等史料，指出朝鮮從「事大交鄰」的立場出發，在面對滿洲時常為自身利益操弄日本議題，為此浦廉一主張日本曾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朝鮮半島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女真人在王辰倭亂期間已認識到日本的存在，並試圖通過朝鮮取得日本方面火器。至於日本則在對鮮滿關係的有限認識基礎上，在十七世紀初期重新與朝鮮恢復邦交時，打探滿洲人的軍事實力並試圖介入朝鮮半島局勢。²¹ 浦廉一立基於《朝鮮王朝實錄》，探討日本在朝鮮與滿洲關係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作出具有開創意義的考證，其論文迄今仍具有參考價值；惟與此同時，其研究亦留下許多根本問題尚待解答，如女真人最初是如何通過王辰倭亂認識日本？日本刺探女真情報的真實動機為何？隨著近百年來史學研究的發展，這些議題無疑仍有值得推進乃至發覆之處。

本文在參考浦廉一等先行研究的基礎上，強調在史料及視野層面的開拓。就史料性質及範圍而言，浦廉一倚重《朝鮮王朝實錄》為主的編纂性史料（德文 Tradition），但未能充分利用原始檔案及古文書等遺留性史料（德文 Überrest），故於史實考訂未能究竟。隨著國際學界長期以來逐漸對《承政院日記》、《朝鮮國來書簿》等史料進行整理與公布，²² 本文得以進一步結合運用《朝鮮王朝實錄》以外，內容更為豐富且更加接近遺留性史料的朝鮮記載。不僅如此，相較前人主要利用朝鮮與日本史料，本文則擴充徵引《滿文原檔》、《內閣大庫檔案》等滿漢文檔案，乃至古地圖手稿等圖像史料，以期進一步發掘滿洲對近世東北亞地緣政治及資訊流通等層面所發揮的歷史作用。此外，就歷史觀點而言，浦廉一的論述亦沾染明顯的時代色彩。在 1932 年滿洲國成立不久且日本方面高倡「滿鮮一體」口號的歷史背景下，浦廉一刻意強調朝鮮事大主義並試圖論證日本因素對朝鮮半島的保護作用，因此即便他徵引的史料記載無疑顯示朝鮮曾利用日本議題對滿洲謀取外交利益而具有主觀能動性（agency），其結論最終仍著重刻畫日本因素對朝鮮的介入，落入朝鮮史他律性的窠臼，這類滿鮮史觀的局限性在第二次

²⁰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 24-48；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22-146。

²¹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44。

²² 《承政院日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一六一九—一六四三》（臺北：國史館，2000）。

世界大戰後已普遍受到日本與韓國學界的批判與反思。²³ 即便如此，筆者認為不宜一筆抹殺戰前日本滿鮮史研究的學術貢獻，是以本文在正視其實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從跨域史及文化交流的觀點出發，超越過往滿鮮史觀預設的國族主義立場，重新探討清朝入關以前滿洲、朝鮮與日本之間的資訊流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學界通過檢討過往滿鮮史學者的學術遺產，進一步促成日朝及中朝關係史等學術領域的發展。在日朝關係史方面，日本戰後第一代學人以中村榮孝（1902-1984）為代表，亦曾對德川幕府與朝鮮王國重修外交之經過，以及女真與明朝方面對日朝關係的留意，有所探討。²⁴ 其後日本學界持續深化日朝關係史中的各項議題，如田代和生探討 1629 年日本對馬藩通使朝鮮的經過，²⁵ 米谷均分析 1620 年代對馬藩與朝鮮外交交涉過程中日本武器輸出等案例研究，²⁶ 勾勒出日本對馬藩與朝鮮釜山之間的貿易架構。至於在中朝關係史方面，戰後夫馬進等日本學者持續開發《燕行錄》史料，以朝鮮燕行使為核心探討明清中國與朝鮮的交往。²⁷ 至於近年來鈴木開、木村可奈子等學人則積極尋找新課題，分別側重將朝鮮的外交政策放置在明清中國易代與東亞各國關係等複雜的時空脈絡下進行分析。²⁸ 二戰後國際學界關於中朝關係史的研究，亦有長足的進步，其中不乏將朝鮮外交政策結合明朝與女真關係相互探討者，其中以李光濤（1897-1984）、張存武（1929-2025）、李孟衡、王元崇、宋念申、丘凡真等中、

²³ 井上直樹，《帝國日本と滿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滿州認識》（東京：塙書房，2013）；李孟衡，〈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戰後韓國學界的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特徵與論爭〉，《臺大東亞文化研究》3（2015）：61-100。

²⁴ 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下冊，頁 500-537。

²⁵ 田代和生，〈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一）〉，《朝鮮學報》96（1980）：85-94；田代和生，〈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二）〉，《朝鮮學報》98（1981）：63-76；田代和生，〈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三）〉，《朝鮮學報》101（1981）：51-108。

²⁶ 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藤田覚編，《十七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2000），頁 39-67。

²⁷ 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

²⁸ 鈴木開，《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東京：刀水書房，2021）；木村可奈子，《東アジア多國間關係史の研究：十六—十八世紀の國際關係》（京都：思文閣出版，2024）。

英、韓文先行研究為代表。²⁹ 以上學界既有成果主要從外交史的視野，為本文探討滿洲與日本二者經由朝鮮認識彼此，提供歷史背景輪廓。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後日本學界對「滿鮮一體」史觀的反思，加上日本國史與東洋史在學科發展上日益專精分化，造成滿洲入關前史與日朝、中朝關係史等不同領域逐漸分道揚鑣，各自聚焦於所擅長的史料梳理及個案研究，分別形成獨具一格的研究典範，而較少有中長時段的全面性綜合論述。³⁰ 這樣的研究趨勢固然促成個案研究的風氣及特定學科的深化，卻也為兼具明朝、女真、朝鮮與日本等多重視野的跨域交流史研究留下未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而這也是本文研究旨趣有別於學界既有成果之處。

相較立基於外交關係與國際政治等議題的中日朝關係史領域，近世東亞海域史研究則在海上貿易、商民往來及文化交流等議題上有所開拓，諸如大庭脩（1927-2002）、松浦章、陳國棟、劉序楓、中島樂章等海內外學人之研究，³¹ 對

²⁹ 李光濤，〈記奴兒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48）：173-191；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張存武，〈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張存武著，吳政緯編校，〈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卷一）〉（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21）；李孟衡，〈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구범진，〈조선시대외교문서：명·청과주고받은문서의구조분석〉（서울시：한국고전번역원，2013）；Yuanhong W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9*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Nianshen Song,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³⁰ 薛明，〈日本學界關於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3期：30-37。

³¹ 大庭脩，〈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東京：岩波書店，2001）；松浦章，〈清代中国琉球貿易史の研究〉（宜野湾：榕樹書林，2003）；松浦章，〈近代日本中国台湾航路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2005）；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2007）；陳國棟，〈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1603-1607）〉，《臺灣文獻》60.3（2009）：33-62；陳國棟，〈十七世紀日本的絲割符制度與中日間的生絲貿易〉，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增訂版）〉（臺北：遠流，2013），頁163-190；劉序楓，〈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6（1988）：133-161；劉序楓，〈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1999）：435-473；中島樂章，〈14-16世紀、東アジア貿易秩序の変容と再編—朝貢体制から1570年システムへ—〉，《社会経済史学》76.4（2011）：3-26。

本文均有啟發。值得注意的是，多年來東亞海域史與中日朝關係史因關注議題上的重疊，多有相互借鑒呼應之處，這也促成近年來學界出現綜合外交史與東亞海域的視野，探討明朝、女真、朝鮮與日本等多方勢力互動往來的風潮，以薛明、陳波、仲光亮、程永超、沈玉慧等人的著作為代表，³² 這些中日關係史、東亞海域史領域的相關成果，分別從情報搜集與外交政策的角度，留意朝鮮在明清鼎革之際的女真與日本之間扮演著消息傳遞的角色，如朝鮮方面曾根據與對馬藩來使在釜山倭館的問答，頻繁向滿洲遞交倭情咨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承志、莊聲、馬騰（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等清史學者，亦從滿文書籍、地圖的製作及流通所體現之內亞因素，來觀照近世中國與東亞間的文化交流。³³ 惟清朝入關以前早期滿洲人與周邊地區間的資訊傳遞、知識交流等議題，尤其是對東北亞地緣政治的認知，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為推進內亞與海洋多元史觀的對話，本文在參考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藉由發掘新興滿漢文檔案與圖像史料，結合資訊與知識史的視角，深究清朝入關以前女真、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如何形塑滿洲人對東瀛的認知，從而與十七世紀前期東北亞跨域文化交流及地緣政治格局發生互動。

在回顧前述先行研究的前提下，本文的研究旨趣可歸結為三點：首先，在史源上開拓滿洲、明朝、朝鮮及日本的多語種史料，尤其強調在結合編纂性史料之外，重點運用原始檔案、古文書、古地圖等遺留性史料。其次，從跨域的世界史思維，跳脫滿鮮史學與國族史觀的窠臼，在綜合分析個案研究的基礎上，觀照資

³²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陳波，〈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情報搜集——以清朝入關前後為中心〉，《江海學刊》2014 年 4 期：147-155；陳波，〈明清交替之際中朝日三國的外交關係與文人交流——聚焦明清鼎革期間東亞國際政治與文化的諸相〉，한일관계사학회（韓日關係史學會）編，《한일수교 50 년, 상호이해와협력을위한역사적재검토（韓日建交 50 年——相互理解和協力的歷史再檢討）》（首爾：景仁文化社，2017），第 2 卷，頁 145-236；仲光亮，《日本江戸幕府搜集中國情報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7）；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2021）；沈玉慧，〈十七世紀朝鮮交鄰政策之轉變——以對日、後金往來文書為例〉，《漢學研究》41.2（2023）：81-130。

³³ 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9）；莊聲，《帝国を創った言語政策：ダイチン・グルン初期の言語生活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6）；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孔令偉

訊流通與知識建構等宏觀史學議題，從清朝入關以前滿洲人對日本之認識等具體議題入手，並將其放置於女真、中原、朝鮮、日本等東北亞各地間跨境歷史脈絡中來理解。最後，通過闡釋女真人在建立內亞政權的過程中持續經由朝鮮半島隔海搜集日本資訊，以及德川幕府與對馬藩對滿洲軍事力量的關注，本文彰顯內亞與海洋視野相互參照所揭示的史學意義，亦即指出內亞大陸與海洋世界不僅並非截然對立，實則多有交流匯通。

二・倭子大國：金國對日本認知起源

十六世紀後期，建州女真在努爾哈齊（1559-1626）的統領下迅速崛起，不僅將視野投向內陸的明朝與蒙古，更經由朝鮮半島認識到隔海的日本。明萬曆二十年（1592），日本關白豐臣秀吉（1537-1598）發兵朝鮮，遂與朝鮮及明朝援軍爆發衝突，朝鮮名之「壬辰倭亂」，中國呼為「朝鮮之役」，日本則稱「文祿慶長之役」。³⁴ 此次戰役，努爾哈齊部下馬三非曾向明廷請纓進入朝鮮，對抗日本，對此《朝鮮實錄》載：

兵部令遼東都司移咨有曰：「今據女真建州貢夷馬三非等告稱：『本地與朝鮮界限相連，今朝鮮既被倭奴侵奪，日後必犯建州。奴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如今朝貢回還，對我都督說知，他是忠勇好漢，必然威怒，情願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³⁵

由此可見，在壬辰倭亂爆發的同年，女真人便已得知日本渡海進軍朝鮮半島。關於十六世紀末女真人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認識起源，浦廉一以明清兩朝《實錄》無載，推測朝鮮與女真一衣帶水，雙方應該多有通曉彼此語言之人，自然應曾聽說日本進軍朝鮮此等大事。³⁶ 惟這種猜想並無文獻根據，實際上史料記載當時女真人乃係通過前往北京朝貢，從明朝方面聽聞壬辰倭亂的相關情況。萬曆十七年

³⁴ 《明實錄·神宗顯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卷296，萬曆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頁5519；李光濤，《朝鮮「壬辰倭禍」研究》；笠谷和比古、黑田慶一，《秀吉の野望と誤算：文祿・慶長の役と関ヶ原合戦》（東京：文英堂，2000）。

³⁵ 《朝鮮王朝實錄·宣宗昭敬大王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卷30，宣祖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頁16。

³⁶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27-28。

(1589) 努爾哈齊派遣麾下通曉漢語的將領馬三非進京朝貢輸誠，因此獲明朝冊封都督稱號，得以藉勢雄長女真諸部。³⁷ 此後萬曆二十年壬辰倭亂爆發，適逢馬三非進京朝貢，對此《東夷考畧》載：「倭陷朝鮮，中朝徵兵檄如雨。貢夷馬三非乃稱建州與朝鮮錯壤，奴酋忠義，控弦數萬，可檄征倭報效。不果。」³⁸ 關於馬三非其人，乃努爾哈齊的心腹，壬辰倭亂前後曾數度代表建州女真前往明廷進京朝貢，如《神廟留中奏疏彙要》載萬曆「二十三年（1595）建酋部夾馬三非，朝貢在京，奏討加賞」。³⁹ 根據以上馬三非的陳述，可知他在萬曆二十年前往北京朝貢，因當時明廷大舉徵兵抗擊倭寇，馬三非遂得聽聞日本進軍朝鮮一事。

由是馬三非隨機應變，當下主動向明朝提出返回遼東後可遊說努爾哈齊出兵，待冬季河水結冰，即可率女真部隊南渡鴨綠江對抗日本。根據馬三非的反應，可見至遲在壬辰倭亂爆發前後，女真人已對隔海的日本勢力有所顧慮。然相較於日本，朝鮮當局對於建州女真亦充滿不信任，最終以女真諸部過去屢啟邊釁為由，懷疑其出兵動機叵測，故未同意女真人進入朝鮮半島與日本部隊交戰。⁴⁰ 馬三非返回建州後，曾向努爾哈齊稟告在北京聽聞壬辰倭亂的情報，以及明朝方面對女真出兵的態度。萬曆二十四年（1596）明朝派遣軍官余希元前往遼東調解女真與朝鮮糾紛，努爾哈齊自陳素來對朝鮮以誠相待：「我豈敢擅興兵馬，加於朝鮮哉？壬辰年間，朝鮮被侵於倭奴，吾欲領兵馳救，稟報於石尚書，不見回答，故不得相援。」⁴¹ 可見努爾哈齊在通過馬三非聽聞壬辰倭亂的情形後，曾向時任兵部尚書石星（1537-1599）請命赴朝抗倭，但此議遭到朝鮮方面杯葛而最終擱置。

在馬三非本人之外，其子馬臣亦通曉漢語，曾作為努爾哈齊副將，奉命搜集日本情報。萬曆二十三年建州女真部眾越境採參，為朝鮮邊將殺害。努爾哈齊曾派遣馬臣前往圖們江邊境，與朝鮮方面談判邊界衝突，故朝鮮方面留下記載，稱：「馬臣，馬三非之子，老乙可赤（按：即努爾哈齊）副將也……年年進貢天

³⁷ 茅瑞徵，《東夷考畧》（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頁548a；關於萬曆十七年馬三非入貢背景，參：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81。

³⁸ 茅瑞徵，《東夷考畧》，頁548a。

³⁹ 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彙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第31冊，卷11，葉27b。

⁴⁰ 《朝鮮王朝實錄·宣宗昭敬大王實錄》卷30，宣祖二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頁16。

⁴¹ 《朝鮮王朝實錄·宣宗昭敬大王實錄》卷72，宣祖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頁19。

朝，慣解華語。」⁴² 另一方面，朝鮮亦於同年派遣使者申忠一（1554-1622）前往建州老營費阿拉（fe ala）與女真進行協調。值得注意的是，馬臣在與朝鮮來使談話的過程中，曾積極打探關於日本的情報，並被申忠一記入《建州紀程圖記》中：

馬臣曰：「你國沿江地面，留置降倭云。然乎？」臣曰：「然。」馬臣曰：「其數幾何？」臣答曰：「約五、六千。」馬臣曰：「緣何留置沿江地面？」臣答曰：「倭奴慕義來降，我國皆給與衣食，俾得安插。渠輩感恩懷德，願住邊上，為國御侮。我國嘉其誠款，分置沿江諸郡矣。」馬臣曰：「倭子等狀貌壯大云，然耶？」臣曰：「形體甚小，能潛行草間，放丸必中。」馬臣曰：「雖遠且小，能中否？」臣曰：「倭銃能中飛鳥，故曰鳥銃。」馬臣出鐵盔以示，曰：「能透得這盔否？」臣曰：「鳥銃放丸，能穿兩重真木防牌籠以薄鐵者，透過此盔，何足道哉！」馬臣則曰：「豈至於此乎？」諸胡立於左右者，皆相顧愕然。⁴³

根據以上記載，可見壬辰倭亂之後，朝鮮曾將約五、六千名的日本降兵安插在圖們江畔守邊，故女真人對其有所認識。馬臣不僅留意這些日本降兵的數量、來源、體格，並從申忠一口中得知這些日本士卒善於使用鳥銃，不僅命中精準，威力更是驚人，甚至能打穿薄鐵包覆的兩重真木防牌，令女真人感到驚愕。值得注意的是，朝鮮使臣在談話中曾憑藉這些降倭所掌握的火器技術，用以恫嚇馬臣等女真將領。至於十六世紀後期日本軍士之所以能夠操作先進的鳥銃，與大航海時代西方科技東傳的整體歷史背景有關。天文十二年（1543）前後漂流至日本大隅國種子島（今鹿兒島）的葡萄牙人，將歐洲火器技術引入日本，史稱「鉄砲伝来」。日本戰國時代各大名間的軍事角逐，亦對日本熱兵器的發展造成長足影響。⁴⁴ 在以上多重的歷史背景下，十六世紀末日本改良之鳥銃威力強大，通過朝

⁴² 《朝鮮王朝實錄·宣宗昭敬大王實錄》卷 70，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頁 4。

⁴³ 申忠一，《建州聞見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8 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卷 8，頁 176-177；徐恆晉校釋，《建州紀程圖記校注、漢譯《韃靼漂流記》》（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9），頁 27-28。《朝鮮王朝實錄》亦收錄這段文字，惟文字略有差異：《朝鮮王朝實錄·宣宗昭敬大王實錄》卷 71，宣祖二十九年一月三十日，頁 47。

⁴⁴ 宇田川武久，《東アジア兵器交流史の研究：十五～十七世紀における兵器の受容と伝播》（東京：吉川弘文館，1993）；中島樂章，〈一五四〇年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と西歐式火器：朝鮮・双嶼・薩摩〉，氏編，《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頁 99-176；村井章介，〈鉄砲伝来と倭寇勢力：宇田川武久氏との討論〉，《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01（2016）：81-96。

鮮的引介吸引了女真人的注意。由此可見，十六世紀末女真人已通過打聽王辰倭亂及朝鮮降倭之相關情報，對日本產生初步認識，尤其重視其鳥銃技術。隨著十七世紀初期女真人的崛起，其對日本的認識獲得進一步的發展。

公元 1616 年努爾哈齊改元天命，自號英明汗（Genggiyen han，1616-1626 在位），定都赫圖阿拉（Hetu ala），正式建立金國（Aisin gurun），儼然成為當時東北亞一大新興勢力。十七世紀初金國建立前後，當時女真人不僅已對日本有所瞭解，努爾哈齊更積極強調對日本資訊的搜集與認識。也由於努爾哈齊本人的重視，日本資訊得以在當時女真貴族之間流通。根據《滿文原檔·荒字檔》，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即金國正式建立之前一年，努爾哈齊曾以諸國歷代得失訓諭諸子，其云：

凡漢人、朝鮮、倭子、蒙古等諸大國之汗王、貝子，累世持善修德而成事之例；或居心兇惡、重財輕德而亡失之例，一切政道，我皆聞知。⁴⁵

在努爾哈齊的這番談話中，日本被稱為「倭子」（oose），並被視為足與漢人、朝鮮與蒙古並立之「大國」（amba gurun），從而成為當時女真人觀察借鑒之對象。至於努爾哈齊對日本的認知來源，在相當程度上倚重馬三非、馬臣等通曉漢語之心腹，在王辰倭亂發生後對明廷、朝鮮方面的情報搜集。

隨著金國的建立，女真人亦積極展開對外擴張，在此歷史脈絡下，女真人得以從朝鮮降人處攫取有關日本之資訊。天命三年（1618），即明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齊以告天七大恨正式向明朝發難，對此明朝除了派出薊遼一帶守軍外，亦令朝鮮遣兵參戰對抗金國。在主和的光海君（1575-1641）與主戰的眾臣間幾番拉鋸下，朝鮮最終決定派遣姜弘立（1560-1627）率兵援明。⁴⁶ 然天命四年（1619）金國大敗明軍於薩爾滸，⁴⁷ 身為援明朝鮮軍元帥的姜弘立託通事乞降，

⁴⁵ 滿文：“bi nikan. solho. oose. monggo yaya amba guruni. han beisei jalan halame sain mujilen be jafabi. erdemu be dasabi jabšaha kooli. ehe mujilen be jafabi ulin be dele. erdemu be fejile seme banjibi ufaraha kooli be eiten doro yoso be gemu ~~donji~~. + bi donjihabi...”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第 1 冊，頁 67。按：本文使用之滿文轉寫係根據學界通行之穆麟德（Möllendorff）系統，惟需注意不同時期的滿文文獻對同一詞彙書寫形態各異。如滿語動詞終止形詞綴，老滿文常作-bi，新滿文中通用-ti，足見有 b、f 混用之情況。為盡可能保存不同時期的滿文史料原貌，本文在處理老滿文時，原則上根據原文字型進行轉寫。

⁴⁶ 對於光海君的外交政策，韓國學界歷來多有爭辯，參：李孟衡，〈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頁 70-74。日本學界近期成果，參：鈴木開，《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頁 53-88。

⁴⁷ 李光濤，〈記奴兒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頁 173-191。

自陳朝鮮與女真並無冤仇，滿文《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錄其自白：「我軍非願來此戰。倭子國（oose gurun）曾攻我朝鮮，盡奪我城郭疆土。那般急難之時，大明之軍助我，逼退倭子（oose），為回報彼等，將吾等領來至此。若爾撫我，我等歸附。」⁴⁸ 姜弘立向金國稱朝鮮出兵助明，主要係為報萬曆年間明廷出兵朝鮮抵禦日本入侵。朝鮮人口中的「倭子國」也藉由通事翻譯，形成女真人對日本的認知。

姜弘立在投降後，努爾哈齊曾派遣通漢語的文臣達海（Dahai, 1595-1632）向其詢問當時朝鮮與日本的外交情況。對此朝鮮士人趙慶男（1570-1641）所作《續雜錄》，曾詳錄姜弘立與達海的對話內容：

大海（按：即達海）來問日本通和事，（姜弘立）答云：「平秀吉與我為仇敵，今則家康盡滅秀吉之族，願從舊好，我國許之。日本稱我國，必曰大國，文書亦甚恭謹。」大海曰：「去年白氣，貴國亦見之否？」曰：「見之。」海曰：「滿初（按：即努爾哈齊尊號）見白氣曰：『朝鮮、日本兵必來云。』果是貴國兵來。」……（姜弘立）仍曰：「日本兵我國可以借來，而今之出兵，實非本意，故不為云。」⁴⁹

這段記載顯示，女真人雖在薩爾滸之役大勝明朝與朝鮮聯軍，卻並未以此自矜，反而持續關注當時朝鮮與日本間的雙邊外交。通過姜弘立的答覆，達海得知壬辰倭亂以後日本國內政局的重大變化，尤其是德川家康（1543-1616）取代豐臣秀吉一系後日朝關係的和緩。日本元和元年（1615）德川家康經歷大坂之役，消滅豐臣家勢力，統一日本。光海君九年（1617），即日本元和三年，朝鮮方面派遣通

⁴⁸ 滿文：“meni cooha ere dain de buyeme jhengge waka. oose gurun meni solgo be dailafi ba na hecen hoton be gemu durihe bihe. tere jobolon de daiming ni cooha mende dafi oose be bederebuhe. terei karu seme membe gajime jihe. suwe ujimbi seci. be dahara.”《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編，《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卷3，天命四年三月一日，頁46。此段滿文文字在康熙朝重修《清太祖高皇帝實錄》漢文本中，稍加潤色譯作：「此來非吾願也。昔倭侵我國，據我城郭，奪我疆土，急難之時，賴明助我，獲退倭兵。今以報德之故，奉調至此，爾撫我，我當歸附。」《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6，天命四年三月一日，頁83。至於乾隆年間編纂《滿洲實錄》時則以新滿文 odz 重抄入關以前老滿文 oose。《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5，天命四年二月十五日，頁249-250。

⁴⁹ 趙慶男，《續雜錄》（收入氏著，《亂中雜錄》，秋，漢城：趙台熙，1964），卷1，頁41。

信使前往日本京都，通過刷還日本俘虜，與德川幕府建立聯繫。⁵⁰ 此後女真方面亦曾聽聞日本與朝鮮和好，並懷疑薩爾滸一戰朝鮮軍隊中有日本士兵參與，故達海在與姜弘立的談話中刻意強調，努爾哈齊早已通過觀白氣，預料朝鮮會夥同日本來犯。古代中國觀天者以白色煙氣為兵戎之兆，如《漢書·谷永傳》載：「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⁵¹ 至於努爾哈齊對白氣的認識，則直接源自《三國演義》。晚明黃道周（1583-1646）纂《博物典匯》載努爾哈齊年少即嗜讀《三國演義》：「奴酋稍長，讀書識字，好看《三國》、《水滸》二傳，自謂有謀略」；⁵² 又《三國演義》在描述孫堅進入歷經戰火摧殘的洛陽城時，曾觀白氣而興感慨：「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堅歎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不覺淚下。」⁵³ 由此可見努爾哈齊將白氣視為戰爭預兆的說法，當源自其對《三國演義》的理解。要言之，努爾哈齊試圖憑藉預觀白氣的說法，經由達海向姜弘立打探朝鮮部隊中是否有日本援軍。對此姜弘立回稱朝鮮本可向日本借兵，惟因並非真心攻打女真，故未與日本聯軍。

值得注意的是，奉命前往薩爾滸援助明軍的姜弘立所部中，多有王辰降倭。姜弘立戰敗投降後，朝鮮方面盛傳副元帥金景瑞（1564-1623）曾欲夥同所部降倭暗殺努爾哈齊，為姜弘立告發。金景瑞事洩後，女真人將他連同麾下降倭百餘人一併處決。⁵⁴ 此後朝鮮文人更是以此傳言為母題（motif）創作〈姜虜傳〉等文學書寫，穿鑿出三百名日本武士佯裝表演劍術，試圖刺殺努爾哈齊未果的悲劇故事。⁵⁵ 〈姜虜傳〉中的小說情節固不為史家所取，然卻體現十七世紀前期朝鮮士人欲憑日本武力抗擊女真之心境。至於女真對日本與朝鮮交通的顧慮，則與前述

⁵⁰ 仲尾宏，《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日朝關係史論》（東京：明石書店，2000），頁 324-362；羅麗馨，〈江戸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以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中心〉，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頁 135-196。

⁵¹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卷 85，頁 3452。

⁵² 黃道周，《博物典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第 16 冊，卷 20，頁 15a。

⁵³ 羅貫中編著，毛宗崗批評，饒彬校訂，《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89），頁 35。

⁵⁴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 33-36。

⁵⁵ 李健，〈姜虜傳〉，氏著，《葵窓遺稿》（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卷 12，頁 203-204；신해진、정지용，〈東事雜錄本〈姜虜傳〉해제및역주〉，《어문논총》17（2006）：185-186；崔雄權、褚大慶，〈韓國古典漢文小說〈姜虜傳〉의文本結構及其文化意蘊〉，《外國文學研究》2011 年 1 期：118-127。

孔令偉

萬曆二十三年馬臣與申忠一等人圍繞圖們江一帶降倭的問答，息息相關。在此背景下，天命四年金國試圖由達海採取姜弘立的口供，從而進一步得知日本方面在大坂之役後，德川家康已擊敗豐臣氏一族並與朝鮮交好的實況。另一方面，姜弘立亦試圖在女真人面前，誇大德川幕府對朝鮮的友好態度，甚至宣稱朝鮮可從日本借兵，惟朝鮮在薩爾滸之役並非有意攻打金國，故不為之。姜弘立宣稱朝鮮可從日本請兵一事，雖係為誇大朝鮮國勢之飾詞，卻也觸動當時女真人敏感的地緣政治神經，從而持續為金國所關注。

自十六世紀末期以降，努爾哈齊所統領的建州女真便圍繞著朝鮮的地緣政治問題，逐步建立其對日本的認知。先行研究曾根據有限的朝鮮史料，猜測萬曆二十年建州女真從毗鄰鴨綠江流域的朝鮮人處得知王辰倭亂，此後通過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戰役中的朝鮮降倭進一步形成其對日本的認識。⁵⁶ 本文則在更加全面掌握滿漢文史料的條件下進行發覆，明確指出萬曆二十年建州女真派遣馬三非前往北京朝貢，遂自明廷獲悉王辰倭亂情形，此後努爾哈齊向明朝兵部尚書石星提議參與朝鮮之役征討日本，終因朝鮮杯葛而未果。至萬曆二十三年女真與朝鮮議定邊務時，警覺朝鮮方面在圖們江沿岸安插大量善於鳥銃之日本降兵，在在顯示女真人早在十六世紀末便已十分留意滯留朝鮮的日本降兵及其鳥銃技術，而不待1619年薩爾滸戰役勝利後。根據滿文檔案，1616年金國建立前後，努爾哈齊更是將呼為「倭子」（oose）的日本，視作與明朝、朝鮮及蒙古並立的大國，從而再三關注。這也是為何薩爾滸之役後，金國積極搜集朝鮮降將姜弘立之口供，進而認識到元和元年大坂之役德川家康消滅豐臣家勢力後，日本幕府與朝鮮王室通好等東北亞國際政治之變化。與此同時，朝鮮軍隊中的降倭，乃至於向日本借兵的傳聞，始終為金國所忌憚。此後隨著金國的對外擴張，為因應當時東北亞複雜之地緣政治發展，女真人持續搜集外國情報，從而愈加關注日本問題。

三・合勢討胡：日本、朝鮮與明朝的女真認知

金國在薩爾滸戰役以少勝多，擊敗明朝及朝鮮聯軍，使得東北亞地緣政治產生重大變化。十七世紀20年代金國與明朝軍事衝突的白熱化，亦使得日本當局經由朝鮮方面開始留意女真人在遼東的崛起，甚至形成假道朝鮮共同攻打金國的構

⁵⁶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25-39。

想，而其背後實有明朝對外政策之影響。薩爾滸戰役的勝利，亦促成金國積極整備經略周邊地區，尤其是在明朝對遼東實施經濟封鎖的情況下，將目光投向鴨綠江口及朝鮮灣一帶諸如皮島（今朝鮮平安北道鐵山郡下轄椴島）等島嶼間的走私貿易。在調查這些沿海島嶼的過程中，金國亦意外從朝鮮處獲取日本欲隔海發兵之消息，從而展開對日本的情報搜集。

明泰昌元年（1620），金國趁薩爾滸大捷之勢，企圖攻掠遼陽一帶；⁵⁷ 至明天啟元年（1621），即金天命六年，努爾哈齊先後攻佔瀋陽、遼陽諸城，明朝九邊防禦體系的遼陽鎮遭受金國嚴重挑戰。⁵⁸ 女真經薩爾滸之役後進逼朝鮮、攻打遼陽的消息，經由中國東南沿海傳入日本，據朝鮮史料《東萊府接倭狀啓謄錄可考事目錄抄冊》（一名《接待事目錄抄》）載，1621年正月朝鮮接待日本來使時，曾談論此事：「宣慰宴時，倭使云：『關伯（按：即幕府將軍，考證詳下文）因南京商人聞撻賊犯搶中國，作據朝鮮，故欲發兵來，調興以元無此事，止之』云。」⁵⁹ 由此可見，通過當時南京與長崎間的貿易網絡，時任幕府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1605-1623 在位）曾聽聞薩爾滸戰役後金國、朝鮮與明朝之間地緣政治勢力的消長，甚至曾想隔海發兵介入東北亞大陸局勢，但被當時與幕府關係友好的對馬藩家老柳川調興（1603-1684）諫止。⁶⁰ 對馬藩為顧及自身與朝鮮半島的貿易利益，對江戶幕府假道朝鮮進攻女真一事抱持消極態度，故德川秀忠曾責問柳川調興等對馬藩臣未將女真攻打遼東的情報即時稟告：「前日遼東陷奴之日，關白責調興以趁不告知，及聞遼東本非朝鮮之地，竟不治罪。」⁶¹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打聽女真的擴張情況，江戶幕府得以進一步釐清遼東與朝鮮之間的地緣關係。

另一方面，為圍堵努爾哈齊的對外擴張，明朝在遼東的軍事部署有所異動。明天啟元年（1621）在遼東經略熊廷弼（1569-1625）的提議下，明廷令梁之垣（1579-?）為行監軍道，出使朝鮮賁送賞功銀三萬兩，試圖通過資助朝鮮達成牽制

⁵⁷ 《明實錄·熹宗愍皇帝實錄》卷4，泰昌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頁210-211。

⁵⁸ 《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7，天命六年三月一日，頁100-102；天命六年三月十九日，頁102-104。

⁵⁹ 《東萊府接倭狀啓謄錄可考事目錄抄冊》（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頁6a。

⁶⁰ 田代和生編，《御上京之時每日記》（東京：ゆまに書房，2023），頁355；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頁44-45。

⁶¹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15，仁祖五年三月十一日，頁55。

孔令偉

遼東之戰略目的。⁶² 此後毛文龍（1576-1629）復於天啟二年（1622）開東江鎮，一方面通過招收遼東流民推行屯墾，另一方面以位於鴨綠江口東、西朝鮮灣之皮島，作為明朝、金國以及朝鮮之間的走私基地，積累經濟實力。⁶³ 在毛文龍的經營下，皮島被明朝視為東北邊疆防禦金國之重要武裝勢力，乃至當時有「海外長城」之稱。⁶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登津山寧四鎮海圖〉（圖 1），特將皮島標註為「毛帥建鎮之地」，⁶⁵ 其對於明朝遼東海防政策之重要性，可見一斑。



圖 1：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登津山寧四鎮海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平圖 021455）

⁶² 《明實錄·熹宗愍皇帝實錄》卷 13，天啟元年八月十三日，頁 662-663。

⁶³ 葉高樹，〈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2009）：121-196。

⁶⁴ 《明實錄·熹宗愍皇帝實錄》卷 42，天啟三年十二月七日，頁 2183。

⁶⁵ 〈登津山寧四鎮海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455）。

明朝在遼東外海以及朝鮮半島的政治軍事舉措，引發金國的忌憚。天命七年（1622）努爾哈齊遣女真將領揚古利（Yangguri, 1572-1637，朝鮮史料作彥加里）致書朝鮮，一方面打探梁之垣及毛文龍所部動向，另一方面質問朝鮮為何不寄送國書。當時金國對朝鮮與日本交通情況亦有所疑慮，故對此朝鮮方面回覆：「日本亦無國書往來之事，而只以邊臣書契通好，至今貢獻不絕。南方倭人亦多留在，朝夕渡海，恭遜不替，則我國亦忘讎善待。」⁶⁶ 朝鮮在與金國交涉申辯國書問題的同時，亦透露當時其與日本交好的情況，尤其是半島南部的釜山有日本人頻繁經由對馬島往來乃至居留的動態。也正是通過當時與朝鮮的交往，日本方面得以進一步打探薩爾滸戰役後金國在東北亞崛起的情報。

另一方面，金國攻佔遼瀋不久，日本幕府亦經由前往長崎的中國商人，得知女真人在遼東擴張的情報。日本元和七年（1621）臨濟宗僧人規伯玄方（1588-1661）代表對馬藩出使朝鮮，翌年初玄方一行抵達釜山。該使團此行試圖突破萬曆三十七年（1609）日朝雙方已西約條之例，⁶⁷ 希望日本使者可以從釜山倭館前往朝鮮首都漢陽，甚至提出可以派兵援助朝鮮對抗女真的提議。⁶⁸ 然而朝鮮方面即以「西賊侵侮天朝，天朝將官，方駐札京中，決難依從」為由，⁶⁹ 拒絕玄方的提案。由此可見，天啟元年以後為聯合朝鮮壓制金國的向外擴張，明朝曾派遣武官駐紮漢陽。朝鮮官員亦依憑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拒絕日本使團直接前往漢陽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日本確知當時金國儼然已成為明朝與朝鮮的軍事威脅。

薩爾滸之役後，光海君雖對明朝與金國採取兩面外交政策，避免將朝鮮捲入戰火；然光海君的外交政策，多被朝鮮士人視作背明通虜之舉，導致光海君十五年（1623）西人黨主導發動政變，擁戴綾陽君李倧即位，即後世朝鮮史家所謂仁祖（1623-1649 在位）反正。⁷⁰ 此後一方面為反對前代光海君的對金政策，朝鮮士人強調從明抗金的事大政策；另一方面，朝鮮仁祖起初雖未徹底與金國決裂，

⁶⁶ 《朝鮮王朝實錄·光海君日記（太白山本）》卷 177，光海君十四年五月十三日，頁 110。

⁶⁷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廖敏淑，〈清代中、朝、日邊境貿易——以柵門及倭館貿易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 年 3 期：126-137。

⁶⁸ 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頁 44-45。

⁶⁹ 《邊例集要》（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卷 1，頁 2a-b。

⁷⁰ 關於後世史家對仁祖反正事件的詮釋與辯論，參：李孟衡，〈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頁 74-80。

卻因為李适之亂後等複雜的政治因素，逐漸對金國採取敵對姿態。⁷¹ 值得注意的是，仁祖之後朝鮮官方聯繫對馬藩，一方面雖以明朝勢力為由拒絕日本直接援兵對抗女真，另一方面卻多次請求對馬藩輸送鳥銃、倭刀、硝石、鉛鐵等武器。據統計，自仁祖元年迄四年（1623-1626），朝鮮方面至少從對馬藩進口鳥銃 245 挺、硝石 2,500 斤、鉛鐵 1,000 斤、硫磺 500 斤。⁷² 朝鮮此舉，明顯係為加強武裝用以備禦女真。至於金國方面，則因皮島的漢人軍事集團及其毗鄰的朝鮮，多與明朝互通聲息，視二者為心腹大患，故天聰元年（1627）皇太極接掌金國汗（1626-1636 在位）之初便下令：「朝鮮屢世獲罪我國，理宜聲討，然此行非專伐朝鮮也。明毛文龍近彼海島，倚恃披猖，納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鮮可取，則竝取之。」⁷³ 最終導致 1627 年丁卯戰爭爆發，金國兵臨朝鮮首都漢陽，同年三月金國與朝鮮訂立盟約，雙方關係隨著開放互市而一度趨於平緩。⁷⁴

值得注意的是，丁卯戰爭爆發不久，日本方面旋即通過對馬島與釜山之間的交通往來，得知金國進逼朝鮮的消息，日本對馬藩史料《交隣考略》載：

寬永四年（1627）春二月，東萊府使柳大華贈書於本州（對馬），曰：「獫狁犯我國之西鄙，國中騷擾，各官力不暇，接待送使，禮也，願貴州念國難，撤回使船，以救一時之急。事定之後，復修歲禮，幸甚」云云。於是寬永四年春三月，遣古川右馬之助，而問其事勢，欲差援兵。厥後朝鮮亦告胡賊安定焉。⁷⁵

由此可見，寬永四年年初對馬藩再度遣使釜山欲前往漢陽，惟當時朝鮮方面以女真來犯為由，婉拒來使。在聽聞丁卯戰爭的情報後，對馬藩藩主宗義成（1604-1657）旋即再度派遣家臣古川右馬之助前往釜山探聽消息。⁷⁶ 隨著與朝鮮之間的交涉，丁卯胡亂的消息一時在對馬島廣為人知，與江戶幕府 1621 年欲發兵援助朝鮮抗擊女真的主戰立場截然不同，對馬島島民們為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及社會安

⁷¹ 鈴木開，《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頁 135-140。

⁷² 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頁 46-51。

⁷³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天聰元年正月八日，頁 31。

⁷⁴ 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

⁷⁵ 神宮司庁編，《古事類苑·外交部》（東京：神宮司庁，1903），卷 9，頁 574。

⁷⁶ 宗義成，史料又作平義成，宗氏本係對馬大名，惟室町中期自稱為桓武平氏平知盛（1152-1185）之後，故又以平為氏。古川右馬之助，又名古川右馬助，此人在宗義成麾下主秘書事，曾經手當時對馬藩通使朝鮮文書，事見：米谷均，〈近世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図書」の使用実態〉，《史観》144（2001）：1-15。

定，抱持反戰立場，並請求朝鮮當局與對馬藩家老柳川調興暗中協商，藉此勸阻幕府出兵朝鮮一事。關於對馬島島民的反戰立場，《朝鮮王朝實錄》有生動的記載：

倭人聞西賊犯邊，轉相驚告曰：「今可秘報調興，預自周旋。不然，年少喜事之人，必爭先出援，小島先被蹂躪之禍。且聞刷還飄風船，自本島出來，聞奴賊深入宣川之說，已漏於島中」云。⁷⁷

根據以上對馬島居民口供，可知當時從朝鮮刷還的日本漂流民，多經由對馬島返回日本，成為當時日本探聽丁卯胡亂的消息來源。根據這些漂流民所言，當時金國已入侵至平壤東北的宣川郡，然而相比朝鮮半島局勢，對馬島島民更加擔心這類情報流入江戶為幕府所悉。至於對馬藩官方在聽聞丁卯胡亂的消息後，藩主宗義成及其家臣柳川調興多次遣使釜山贈送鳥銃、大炮、硫黃等武器軍備。⁷⁸ 當對馬藩使者抵達釜山倭館時，朝鮮與金國雖已和談，然朝鮮方面並未拒絕日本所提供的武器，反而鼓勵其繼續前來提供鳥銃，《朝鮮王朝實錄》載：

備局啓曰：「頃日義成、調興，聞我國有邊警，委送兵器，其誠可嘉。今若別加賞賜，以答其忠，仍令許送願納鳥銃之人，則渠必感恩。且倭奴甚喜異國之產，如胡人進上駱駝、鞍具、馬、弓箭等物，稱以陣前所得，令該曹修書契下送，以賞效忠之誠，以謝許買之意宜當。」上從之。⁷⁹

另一方面，對馬藩向朝鮮求取丁卯戰爭過程中所獲女真弓馬，用以進獻幕府。朝鮮則將與金國重新開放互市所獲得之馬匹、駱駝、弓箭與馬鞍回贈日本，並佯稱係與女真交戰所獲之戰利品。⁸⁰

在跨海聽聞丁卯戰爭的消息後，日本方面曾遣使朝鮮主動表示願隔海發兵協助攻打女真，⁸¹ 此事背後緣由頗為曲折。對馬藩經由朝鮮數度打聽女真情報後，寬永五年（1628）宗義成親自前往江戶參見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23-1651在位），並報告丁卯戰爭相關消息。《交隣考略》記其經歷：

⁷⁷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15，仁祖五年三月十一日，頁 55-59。

⁷⁸ 米谷均，〈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頁 52-67。

⁷⁹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16，仁祖五年五月三十日，頁 39。

⁸⁰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 46-47。

⁸¹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 40-45。

東都之執政問義成公（宗氏），以其所聽答之。時藤堂泉州公竊告義成公曰：「願歸州之後，直遣使於朝鮮之漢城，具探問事狀，而可以聞于東都也。朝鮮若有急難，則隣睦之國，要差援兵，是上之意也。」⁸²

此處所云「東都之執政」，日文史料亦稱「相國」，⁸³ 實指當時已把將軍一職讓位其子家光而自任太政大臣的德川秀忠。繼前述 1621 年曾向對馬藩柳川調興詢問女真在遼東擴張一事後，德川秀忠在 1628 年向宗義成詢問丁卯戰爭的情況，席間德川家重臣、伊勢津藩藩主藤堂高虎（1556-1630）暗中提點宗義成，謂秀忠意在通過對馬藩遣使漢陽刺探情報，並試探派遣援兵介入朝鮮半島局勢的可能性。肩負出使朝鮮任務的規伯玄方，其所留下的記載，對此經過亦有詳細敘述。根據日文史料《方長老上京日史》，德川秀忠係通過老中土井利勝（1573-1644）詢問宗義成「朝鮮獐狃鬪亂」之事；⁸⁴ 另據〈方長老口上書之覺〉載，宗義成在返回對馬島前夕，德川秀忠本人向他提到先前已從長崎方面得知丁卯胡亂的消息，並希望宗義成能繼續遣使朝鮮打探相關情報。⁸⁵ 由此可見，幕府對於丁卯戰爭的情報來源多元，除對馬藩外亦倚重長崎商人。

在德川秀忠的授意下，寬永六年（1629）宗義成命規伯玄方再次率使團抵達釜山，並以口頭面陳外交機密為由，要求前往漢陽親謁朝鮮國王李倧，對此《邊例集要》載：

崇禎二年四月日，宣慰使鄭弘溟（1582-1650）時，差倭正官玄方、副官平智廣等，持書契出來，決欲上京，親達所事，而據理防塞。使譯官探其出來主意，則玄方等以為：「關白（按：指德川家光）視貴國如兄弟，聞貴國被劔於山戎，欲發兵相援，姑先使島主親往以稟。而島主不曉文字，以俺代行，故書契中無他說話，只憑俺等口舌，親達國王。」大意如此。⁸⁶

⁸² 神宮司庁，《古事類苑・外交部》卷 9，頁 574。異文另見：松浦允任，《朝鮮通交大紀》（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 6，頁 35。

⁸³ 田代和生、米谷均、金文京、吉田光男編，《方長老上京日史・飲冰行記》（東京：ゆまに書房，2021），頁 13, 15, 175。

⁸⁴ 田代和生等，《方長老上京日史・飲冰行記》，頁 13, 175；田代和生，《御上京之時每日記》，頁 354。

⁸⁵ 規伯玄方，〈方長老口上書之覺〉，《朝鮮物語附柳川始末、朝鮮風俗》（福岡：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頁 10-11；田代和生，〈寬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每日記』とその背景（一）〉，頁 94。

⁸⁶ 《邊例集要》卷 1，頁 2b-3a。

弔詭的是，玄方雖宣稱代表日本出使，卻以宗義成不識文字為由，未攜帶國書前來，一度引發朝鮮士大夫的疑慮。⁸⁷ 然而在玄方的堅持下，此次日本使團最終獲得特許，前往漢陽面見朝鮮國王李倧，《攷事撮要》載：「對馬島酋遣僧玄方等，至釜山請上京，口陳機事，朝廷許之，而使後勿為例。玄方至京，請通貢上國，助兵平遼。」⁸⁸ 令人訝異的是，玄方以打通朝鮮半島與中國之間的貢路為由，表示日本願出兵援助朝鮮攻打金國，一雪先前丁卯胡亂之恥。由此可見，丁卯戰爭過後兩年，幕府曾有聯合朝鮮主動進攻女真的提議，故輾轉經由對馬藩聯繫朝鮮。至於玄方等日本來使口中的「關白」，朝鮮史料亦作「關伯」，並非時任日本關白的近衛信尋（1599-1649），而實指幕府將軍德川家光。因豐臣秀吉曾任關白統領日本而為朝鮮所悉，德川氏又代豐臣氏而起，故十七世紀前期朝鮮史料因循慣以關白代稱幕府將軍。如崇德七年（1642）清廷曾向身在瀋陽為質的昭顯世子，詢問有關日本統治者的情報，《瀋陽狀啟》載：

又問：「大君是何名？大君為一國之主乎？」世子答曰：「日本執一國之柄者，本稱關白，而頃年以來，改稱大君。大君之上有天皇，而於一國之事，無所與知。」……又問：「家康者誰也？秀吉乃攻朝鮮者耶？」世子答曰：「家康即今關伯之祖也。平秀吉，即壬辰年作賊者也。」⁸⁹

由此足證 1629 年玄方口中欲隔海發兵援朝抗金者，實乃德川家光無疑，而其背後又有其父太政大臣秀忠的指示。玄方等使臣宣稱日本欲發兵攻打女真的說法，固為前往漢陽以遂其外交及情報任務之託詞成分，但亦體現丁卯戰爭後日本曾考慮藉機進軍朝鮮半島與金國較量之意。

作為壬辰倭亂後唯一被特許前往漢陽並在朝鮮境內旅行的日本使節，1629 年規伯玄方等人所率領的對馬使團，歷來為日朝關係史研究者所留意，田代和生等學人曾根據日本使者日記並結合朝鮮史料，詳細考察使團成員、交通路線及交涉經過等內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⁹⁰ 惟由於日方使團日記的史料性質及日朝關

⁸⁷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24。

⁸⁸ 魚叔權，《攷事撮要》（朝鮮仁祖年間刊本，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卷上，頁 66。

⁸⁹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編，《瀋陽狀啟》（京城：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5），頁 430。

⁹⁰ 田代和生，〈寬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一）〉；田代和生，〈寬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二）〉；田代和生，〈寬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對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三）〉；田代和生等，《方長老上京日史・飲冰行記》；田代和生，《御上京之時毎日記》。

係史研究之問題意識，如何與明代中國史及滿洲入關前史相互發明，進而跨越多元研究典範，從東亞史的整體脈絡解讀玄方局負的機密任務與幕府真實的外交動機，乃至女真與日本雙方經由朝鮮的彼此認知經過，仍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與必要。關於 1629 年日本遣使漢陽期間提議聯軍主動進攻女真一事，浦廉一雖曾留意朝鮮方面的片段記載，但以史料闕如且多有隱晦，難以考訂其真實經過；⁹¹ 至於幕府主動軍援朝鮮的動機，他推測係日本為籠絡朝鮮恢復邦交，不惜採取主動示好的姿態，故浦廉一將此時日方對朝鮮的外交立場視為「稍稍屈辱的傾向」。⁹² 然本文以上考證明示，1629 年宗義成之所以派遣對馬藩使前往漢陽提議攻打金國，主要是遵從作為幕府實權者的德川秀忠之意志，目的在於主動刺探女真情報乃至試圖以武力介入朝鮮半島局勢；至於秀忠對女真情報的關注，亦非一時興起，而是早先便已經由往來中國東南沿海與長崎等地的商人，長期留意薩爾滸及遼陽戰役後金國在東北亞崛起的動態。

至於日本主動聯繫朝鮮提議聯軍攻打遼東的真實動機，亦非單純為恢復邦交，更非為向朝鮮示好而採取不對等的外交姿態。本文以下進一步指出，在日本與朝鮮就金國問題進行外交交涉的同時，明朝方面對於遼東、朝鮮與日本三方的關係，亦有不可忽視的關注與影響。明朝在表面上遏制朝鮮與日本、遼東往來，暗中卻派員鼓動日本聯合朝鮮出兵攻打女真。丁卯戰爭後，明廷於崇禎元年（1628）命袁崇煥（1584-1630）督師薊遼，翌年袁崇煥斬殺掌控皮島走私的毛文龍，使得被明朝視為「海外長城」的東江鎮政局發生動搖。袁崇煥在整肅遼東軍務的同時，亦向明廷題報朝鮮「媾倭款奴」，指摘朝鮮方面與日本、遼東暗通款曲，為此李倬曾特別呈文向崇禎帝自白辯誣；⁹³ 日本方面則對明廷指摘朝鮮「媾倭款奴」一事，亦有所關注。⁹⁴ 最終明廷於崇禎三年（1630）敕諭李倬稱：「釜山飲恨，尚在撫膺；遼左被侵，寧忘指髮」，以王辰倭亂及薩爾滸事為誠，警告朝鮮不可與日本、女真交通。⁹⁵ 要言之，探討十七世紀前期的日朝關係史，在日本及朝鮮二者之外，必須嚴肅考慮明朝與女真的因素。

⁹¹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24。

⁹²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頁 47-48。

⁹³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0，仁祖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頁 33；《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1，仁祖七年七月三日，頁 2；魚叔權，《攷事撮要》卷上，頁 66；沈玉慧，〈十七世紀朝鮮交鄰政策之轉變〉，頁 109。

⁹⁴ 松浦允任，〈朝鮮通交大紀〉卷 6，頁 43-51。

⁹⁵ 〈明崇禎三年諭朝鮮國王勿媾倭款奴敕〉，崇禎三年六月十九日，《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登錄號 038129。

值得關注的是，明朝一方面告誡朝鮮不可與日本往來，另一方面卻秘密策劃促成日本聯合朝鮮攻打遼東。在此背景下，日本對金國的認識來源，乃至其出兵遼東的構想，皆與明朝的對外政策息息相關。1629 年玄方訪問朝鮮時，曾透露明朝策動日本發兵遼東之原委。上引《邊例集要》、《攷事撮要》等史料記載，規伯玄方等日本使者，以事涉軍機為由，堅稱須面見朝鮮國王親口傳達；然而其後朝鮮禮曹判書洪瑞鳳等官員在接待日本使團的宴飲過程中，玄方卻不料鬆口透露幕府欲出兵援助朝鮮對抗金國的真實內幕，對此朝鮮《承政院日記》崇禎二年（1629）四月條載：

禮判洪瑞鳳，與倭使宴享時問答之啓，其所言數三條內一款云：「中國人王良相，自南海往來日本，與關伯相親。此人言于關伯曰：『遼東被胡所陷，本國自前通貢中原，今可與朝鮮、毛文龍，合勢討胡，仍通貢路於遼東。』故關伯欲依此言。對馬島主義成，慮本島受弊周旋；而關伯左右，濫毀島主，島主若不保，則小僧之行，止於此云云。」彼中情形叵測，可慮可慮。⁹⁶

玄方所提及這位經由南海往來日本的王良相，並非尋常中國商旅，他曾擔任明朝的浙江總兵，並在萬曆四十七年（1619）致書德川幕府交涉倭寇問題。⁹⁷ 不僅如此，王良相更向德川家光建議日本聯合朝鮮及毛文龍所部共同攻打金國，由此便可經由遼東與中國通商。幕府雖欲從王良相所言發兵遼東，然對馬藩主宗義成卻擔心其領地捲入前線戰事，或慮重蹈王辰倭亂覆轍，故對出兵朝鮮攻打金國一事有所保留，這也造成當時宗氏與幕府之間的矛盾。玄方甚至向朝鮮透露有幕府近臣向德川家光抨擊其主宗義成，此語實際上體現當時對馬藩家老柳川調興聯合幕府老中土井利勝對宗氏進行掣肘。⁹⁸

⁹⁶ 《承政院日記》卷 26，崇禎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頁 49a。

⁹⁷ 鄭潔西，〈萬曆四十七年投書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總兵」考〉，《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 年 4 期：37-45。按：王良相與日人多有交通，日本與朝鮮方面曾多次誤錄其名，以「杭州衙門王相良」呼之，例見：《東萊府接倭狀啓謄錄可考事目錄抄冊》，頁 5b。餘例參：木村可奈子著，夏歡譯，〈日本入侵琉球後明朝對日的警戒〉，《成大歷史學報》66（2024）：223-257。又王良相在明朝方面的正式官銜雖為「浙江總兵」，其與日本交涉時多用「浙直總兵」名目。明朝設立浙直總兵一職，始於嘉靖三十四年，迄四十二年裁，係當時平定倭亂之臨時職務。王良相之所以用浙直總兵而非浙江總兵名銜與日本交涉，或以為前者對東瀛更具威望。

⁹⁸ 田代和生，《御上京之時每日記》，頁 355-356。

在理解幕府將軍及對馬藩主關於援朝伐金意見相左的實情後，夾處在中國、遼東與日本三方勢力間的朝鮮君臣，更是感到處境艱難，旋即著手議論應對各方之策。崇禎二年五月，朝鮮仁祖李倧與朝中近臣會議商談應對日本發兵遼東之策，至於主導此案議論的朝臣，主要係曾襄贊仁祖反正、時任兵曹判書知經筵事的李貴（1557-1633），他主張應將日本遣使朝鮮並提及發兵遼東之事告知金國。然而仁祖起初以女真人生性多慮，認為「今若以倭人不實之言，經先通知，則彼必反生狐疑，而謂我國與倭相通」，⁹⁹ 對李貴的建議有所保留。但李貴認為如隱瞞日本來使一案，若消息走漏為金國所知，反將破盟引戰，其謂：「倭差之來，虜必無不知之理，自我不通，而渠若先聞，則是益其疑也。既與相和，而不以實相通，則又有害於交隣之道，而盟變為戰矣。」¹⁰⁰ 最終仁祖在李貴的建議下，同意派員以口頭方式，將日本遣使表示願助朝鮮發兵遼東一事，告知金國，並明確表示朝鮮與金國的同盟關係。與此同時，朝鮮政府內部幾經討論後，亦決議將此事通報明廷。¹⁰¹ 對於玄方宣稱幕府欲發兵遼東，卻又未攜來國書，朝鮮方面當時已頗感蹊蹺，對此負責統領禁軍的完豐府院君李曙（1580-1637）便曾上書，指出日本遣使的真實目的並非出兵援朝，並指出日本使團曾代表幕府向朝鮮索請女真人的弓箭、刀劍，應是為打探金國的軍備技術而來。¹⁰²

綜上所述，丁卯戰爭後德川幕府在明將王良相的策動下，曾於 1629 年通過對馬藩向朝鮮提出聯合發兵攻打金國的提議，最終未果。由於日本來使並未攜帶國書，加上獲知幕府將軍與對馬藩主對於出兵遼東意見並不一致，朝鮮方面對於日本的真實來意有所疑慮，決定維持與金國的盟約，並將日本來使的情形告知金國。根據朝鮮所提供的口頭情報，以皇太極為首的金國當局，開始對日本武力介入朝鮮半島局勢產生疑慮。尤其隨著十七世紀 30 年代初金國與朝鮮關係的再度惡化，金國內部遂形成朝鮮「請兵於倭」的疑慮，從而展開相關情搜活動。

⁹⁹ 《承政院日記》卷 26，崇禎二年五月六日，頁 72a。

¹⁰⁰ 《承政院日記》卷 26，崇禎二年五月六日，頁 72a。

¹⁰¹ 《承政院日記》卷 26，崇禎二年五月六日，頁 72a。

¹⁰² 《承政院日記》卷 26，崇禎二年五月六日，頁 76b。

四・請兵於倭：金國對日朝關係之疑慮

十七世紀 30 年代東北亞複雜的地緣政治，促成金國持續關注朝鮮以及皮島等周邊地區的情報，並留意日本武力介入朝鮮半島局勢的潛在影響。繼毛文龍被袁崇煥處決之後，劉興治（?-1631）及其兄弟成為掌控皮島的軍閥，並在天聰四年（1630）隱瞞明廷暗中交通金國，女真人因此得經由皮島走私貿易獲得所需物資。在與皮島軍閥及朝鮮王朝複雜的交往背景下，繼努爾哈齊之後以皇太極為首的金國當局亦頗關注日本情報。

天聰四年金國使臣英俄爾岱（Inggūldai, 1596-1648）、霸奇蘭（Bakiran, ?-1636）在出使朝鮮時途經安州（今朝鮮平安南道），曾向朝鮮人打聽皮島情報。當時女真人已知皮島在朝鮮安州外海，在此歷史脈絡下，形成於十七世紀 30 年代的〈北洋海岸圖〉（圖 2）以紅線繪製當時遼東與朝鮮之交通道路，並以滿、漢文標示安州（An jeo）與皮島（Pi doo）的相對位置。¹⁰³ 英俄爾岱一行在出使朝鮮途中刺探皮島情報的同時，不僅打聽到朝鮮內部政爭的暗潮洶湧，更積極核實自薩爾滸戰役以來朝鮮向日本借兵的傳聞。據《滿文原檔・呂字檔》載天聰四年：

英俄爾岱、霸奇蘭前往朝鮮王一趟時，有黨欲殺朝鮮王篡位，有一人四處奔走，我等抵安州之隔夜，（該人）亦來。彼人所言，請兵於倭子之說亦屬實。¹⁰⁴

由此可見，英俄爾岱等人抵達朝鮮時，雖然光海君當時已被廢黜七年之久並流放至喬桐島，但支持光海君的北人黨殘餘勢力仍暗中策劃刺殺仁祖，並且秘密與金國交通，希望尋求女真人的勢力協助光海君復辟。因此當時有北人黨前往安州與金國使團私下會面，並向英俄爾岱等人宣稱朝鮮欲「請兵於倭子」（滿文 oose de cooha baihangge）。北人黨提供之情報，使得金國更加審慎看待日本武力對朝鮮半島局勢的干預。

¹⁰³ 〈北洋海岸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554）。

¹⁰⁴ 滿文：“inggūldai bakiran solho i han de genehe mudan de solho i han be wabi sorin duriki sehe duwali emu niyalma erei terei bifi meni anju de isinaha jai dobori dosinjiha. tere niyalmai alara gisun oose de cooha baihangge inu mujangga sembi.” 馮明珠，《滿文原檔》第 7 冊，頁 287-288。

孔令偉



圖 2：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北洋海岸圖〉繪安州外海的皮島
(©國立故宮博物院，平圖 021554)

天聰四年英俄爾岱使團在刺探皮島情報時，獲知朝鮮仁祖欲向德川幕府借兵的消息。翌年皮島政局突變，更是引起金國對日本的關注。天聰五年（1631）劉興治集團內部兵變，皮島守軍勢力倒向明朝，與金國交惡。¹⁰⁵ 對此皇太極致書朝鮮，欲借船攻打皮島明軍，卻被朝鮮方面所拒絕。朝鮮在給金國的國書中，以自身與日本關係修好為例，藉「事大交鄰」的話語為由，不願介入周邊國家的紛爭，對此《朝鮮國來書簿》載：

我國曾與日本結讐，酷經戰爭，及其解仇結好，情義無間，三十年來，未嘗有纖芥之疑。蓋我國雖寡弱，一念區區，恒以信義為重。西事皇朝，北和貴國，南通日本，事大交鄰，只保此心，一語虛妄，天心厭之。¹⁰⁶

朝鮮國書中援引與日本邦誼，本意雖係為強調其交友鄰國之中立立場，卻也深化金國對日本介入朝鮮半島局勢的疑慮。與此同時，女真人在難以經由皮島走私取得中國物資的情況下，大幅提高向朝鮮之經濟索求。金國增索貢額之舉，引發朝鮮君臣對女真人的不滿，使雙邊外交關係產生摩擦。翌年皇太極遣使責問李倧背盟，朝鮮方面則拒絕互市，同時加強築城防禦，最終導致雙方關係再度惡化。¹⁰⁷

天聰七年（1633）英俄爾岱再度出使朝鮮時，曾進一步打聽朝鮮「借兵倭國」的情報，並認為背後係由明朝支持。對於此事原委，滿洲入關前之史料曾有詳細記載，滿文《內國史院檔》（*Gurun i suduri yamun i dangse*）稱：

（天聰七年六月）十八日。出使朝鮮之參將英娥代、備禦戴松阿遣人奏曰：「偵知十一日至義州，明船兵退住獐子島；再以船十一隻，載孔元帥部下離散人等妻孥，送入關內。再者，大明（國）遣人與朝鮮汗（王）曰：『何故與滿洲財物？可以不受財物為口實，與之交惡，求兵倭子。我亦相助。何以信任滿洲？滿洲與其同類烏喇、哈達、葉赫、輝發先曾講和，後竟伐之。爾等若與滿洲講和，終蹈前轍。』等語。朝鮮信其言，因求兵倭子，倭子遺書答應助兵四萬，彼國內亦屯聚重兵。遣書義州官，言：『若納我所送財物，彼遣使與我官偕來，則將大明（國）境內兵六百、船九艘，悉

¹⁰⁵ 黃一農，〈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2002）：131-161。

¹⁰⁶ 《朝鮮國來書簿》（縮微膠卷，漢城：漢城大學校附屬圖書館藏），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042。張存武曾根據相關史料對《朝鮮國來書簿》進行校錄，惟與本文所引原文有所出入，本文此處仍照原文錄入，請讀者自行參看：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81。

¹⁰⁷ 鈴木開，《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頁303-342。

孔令偉

行撤回。』等語。又遣二萬人於義州南嶺右側山崗築城蓋房，歷時十五日，工竣而去。若謂此語由何而知，出使瀋陽之通事申打里所言也。」¹⁰⁸
《內國史院檔》中的這段滿文記錄，後被譯為漢文，現存最早的譯本見史語所藏《天聰七年實錄稿》：

（天聰七年六月）十八日。往朝鮮國參將英娥代、備禦戴松阿遣人至奏，云：「十一日至義州，探得明舡回住獐子島，有孔元帥同類人，因舡破遺下妻子，彼用舡十一隻，往解（入關內）。大明復差人諭朝鮮：『滿洲既多索貨物，乘機勿與，可借兵於倭國。我亦發兵助之，何必信他？想滿洲同類之國，兀喇、哈達、野黑、灰發，先前曾講和，後竟滅之，爾若與之講和，終蹈覆轍。』因此朝鮮借兵于倭國，倭國復書助兵四萬，本國亦屯聚兵馬。又移文義州官：『我國所送貨物，彼若收下，復差一官與爾（我使臣）同來，即將在大明的兵六百、舡九隻撤（發）回。』又義州南嶺上（嶺）右邊（遣）二萬人來往，十五日（內）築城蓋房而去。此事何由得知，據瀋陽通事申打里所言也。」¹⁰⁹

¹⁰⁸ 按：引文底線，表示原檔刪改處；（）內表原檔補字。滿文：“juwan jakūn de solgo de elcin genehe. sanjiyang inggūldai. beiguwan daisungga i takūraha niyalma isinjifi wesimbuhe biyoo bithei gisun. juwan nemu de eiju de isinjifi mejige gaici, daiming ni (ming guruni) cuwan (cooha) bederefi jangse doo de bisere. jai kung yuwansuwai duwali cuwan fakcaha niyalmai juse hehesi be juwan nemu cuwan de tebufi dosi benehe sere. jai daiming (ming gurun), solgo i han (wang) de takūrame, manju de ulin ainu bumbi. ere ulin gaijarakū kanangga de eherefī oose de cooha baisu: be inu dara. manju de ainu agdambi. manju ini duwali ula, hada, yehe, hoifa be gemu acafi dubederi dailahabi. suwe manju de acaci atanggi bicibe terei adali ombikai seme takūrahabi. tere gisun de solgo, oose de cooha baihanara jakade. oose duin tumen cooha aisilara seme bithe arafi unggihebi. jai ini gurun i dorgi cooha be inu ambula isabuhabi. eiju i hafan de bithe unggihengge musei benehe ulin be gaijara. musei hafan i emgi ceni elcin jihe ohode. dajming (gurun) de bisire ninggun tanggū cooha. uyun cuwan be bederebu seme takūrahabi. jai ejui julergi dabahan i jebele ergi dalbai den alin i ninggude juwe tumen niyalma jifi tofohon inenggi dolo hoton sahafi. boo arafi genehebi. ere gisun we sambi seci (be). sin yang de elcin genehe sindari tungse alaha sehe.” 神田信夫等編，《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東京：東洋文庫，2003），頁 86-8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天聰朝、崇德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頁 22。

¹⁰⁹ 《天聰七年實錄稿》原藏《內閣大庫檔案》，李光濤自述曾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據此史料撰寫〈清太宗求款始末〉一文，惜因戰亂亡佚。民國三十七年（1948）史語所遷臺後李氏於《史語所集刊》為文回顧此事，以為《天聰七年實錄稿》已陷落大陸，頗為慨然；惟該期《集刊》編者深知史語所搬遷內情，旁加按語稱：「此類史料，當日因刊印故留某

據前引《內國史院檔》及《天聰七年實錄稿》之滿漢文記載，可見金國與朝鮮因增貢問題關係惡化，皇太極一度拒收李倬貢品並斥其背約，在此背景下天聰七年英俄爾岱前往位於鴨綠江南岸的朝鮮義州（今朝鮮平安北道義州郡）試圖溝通並刺探情報，與其同行者尚有朝鮮派駐盛京的朝鮮通事申打里（Sindari，亦作辛達里）。申打里出身朝鮮義州，原姓金氏，於天聰元年（1627）率族人歸附建州女真，改女真名並獲授通事職，此後多次偵探朝鮮情報，逐步獲得皇太極之信任。¹¹⁰由於申打里兼通朝鮮語及女真語，英俄爾岱通過他在義州搜集之消息，得知明朝為強化對其東北邊疆的控制，不僅藉機收編降金將領孔有德（?-1652）滯留遼東外海獐子島（今遼寧省大連市長海縣轄）的殘部，同時更積極挑撥朝鮮與金國的關係。關於明朝離間朝鮮與金國的說辭，《內國史院檔》與《天聰七年實錄稿》翻譯文字有所出入，惟皆反映明朝鼓吹朝鮮在金國增貢問題上，藉皇太極退回禮品之機，與其斷交，同時向日本借兵以對抗女真報復。根據申打里提供的情報，朝鮮方面聽從明朝建議已向日本求援，而德川幕府亦回覆願助兵四萬。與此同時，朝鮮一方面聚集兵馬，並在遼東邊境的義州修築防禦工事；另一方面卻又表面對金國講和，承諾皇太極如願意接納禮品並恢復通使，則朝鮮願意自中國撤回

處，今尚秘藏無恙，即李君原稿亦未必失」。誠然，《天聰七年實錄稿》今存臺北南港史語所，可見民國三十七年業已裝箱隨所來臺，並未失落。至於李氏文稿下落，仍待後學尋訪。〈天聰七年實錄稿〉，天聰七年，《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66977，頁 72a-73a；李光濤，〈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948）：125-128。又自順治朝以降，康熙、乾隆朝史官對《清太宗實錄》漢文本多有修改，本文所引天聰七年朝鮮請兵於倭一事，亦見於《實錄》後出漢文各版，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太宗實錄》初纂本、《清三朝實錄採要》和刻本、乾清宮藏小紅綾本等，箇中差異體現清廷入關後對入關前之歷史記憶持續重構，頗涉清代政治史、史學史、思想史諸議題，識者宜當詳查。《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七年正月至六月》（小紅綾本初纂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03000147；《清三朝實錄採要》（日本寬政九年江戶伍石書軒刊本，東京：国立公文書館藏），卷 3，天聰七年六月，頁 16；《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14，天聰七年六月十八日，頁 194。

¹¹⁰ 申打里在清廷與朝鮮關係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崇德二年（1637）丁丑戰爭後，皇太極將所獲朝鮮俘虜編入正黃旗滿洲包衣，設高麗佐領，命申打里統之。申打里子孫在清廷多有官跡，如其孫常明曾任領侍衛內大臣，曾孫金簡歷任內務府總管大臣、四庫全書副總裁、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要職。李光濤，〈記漢化的韓人〉，氏著，《明清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下冊，頁 639-652；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 5 期：62-73；徐凱，〈八旗滿洲高麗家族與清初戰爭〉，《明清論叢》第 9 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 129-140；李丹，〈明末清初朝鮮移民金氏新達理家族研究〉，《中州學刊》2018 年 5 期：134-138。

孔令偉

派駐明朝的援軍及船隻。根據英俄爾岱轉呈申打里所提供的情報，金國方面嚴肅看待朝鮮向日本借兵的可能性，並且認為背後實與明朝的離間政策有關。因認為朝鮮可能暗中勾結日本勢力對抗金國，此後皇太極更是命人持續搜集朝鮮與日本交通之情報。而根據本文前考，1629 年間日本確實曾遣使朝鮮提議發兵攻遼，由此可見 1630 至 1633 年間金國持續打探朝鮮借兵日本的情報活動，亦非空穴來風。

要言之，自十六世紀末豐臣秀吉派軍進入朝鮮，乃至十七世紀初德川幕府試圖以借兵抗金為名再次介入朝鮮半島局勢，女真人皆對這些相關資訊十分留意，從而形成其認為朝鮮可能「請兵於倭子」的特殊認知。十七世紀 30 年代前後，女真人對日本的認識，也具體體現在其通過滿文對地圖的理解與注釋層面之上。萬曆三十一年（1603），明朝官員李應試（1560-1620?）在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協助下，製作〈兩儀玄覽圖〉（圖 3）。¹¹¹ 女真人在天聰六年（1632）以前，即已取得此漢文地圖，並以當時使用之無圈點老滿文標注地名；¹¹² 而其中漢文原稱的「日本」與「日本海」，也被以滿文分別標記為「倭子」（ose）以及「倭子海」（osei mederi）。¹¹³ 由此可見，十七世紀前期的滿文讀者，傾向將〈兩儀玄覽圖〉中的「日本」理解為滿文的「ose」，而非直接音譯漢字。箇中緣由，與天命、天聰年間對日本以及朝鮮關係的認識，亦有所關聯。金國對於日本武力介入朝鮮半島的疑慮，也促成後來清朝初年經由朝鮮搜集日本情報的態勢。

¹¹¹ 徐光台，〈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漢學研究》30.4（2012）：133-167；鈴木信昭，〈利瑪竇『兩儀玄覽圖』攷〉，《朝鮮學報》206（2008）：21-60。

¹¹² 承志，〈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1（2011）：148-149；Florin-Stefan Morar, “Relocating the Q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1603 World Map by Li Yingshi and Matteo Ricci,” *ISIS* 109.4 (2018): 673-694.

¹¹³ 曹婉如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 57。



圖 3：〈兩儀玄覽圖〉東亞部分
(曹婉如，《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 57)

五・日本通信：清朝初年的貿易探索與情報搜集

公元 1636 年，皇太極改元崇德，稱帝建制，史稱清太宗（1636-1643 在位），象徵清朝的正式成立。隨著與朝鮮關係的演進，清朝方面更進一步搜集日本相關情報。崇德改元後，皇太極遣英俄爾岱等人出使朝鮮，宣布其稱帝之消息。因朝鮮方面不願接受清朝來使之國書，雙方產生外交爭議，遂導致丙子戰爭的爆發。清軍最終於崇德二年（1637）攻破漢陽，朝鮮仁祖投降後被押往三田渡，向皇太極行三跪九叩之禮，史稱「丁丑下城」。皇太極下令朝鮮與明朝絕交，並將昭顯世子送往瀋陽為人質等條件，史稱「丁丑約條」，此後朝鮮正式成為清朝之藩屬國。¹¹⁴ 與此同時，皇太極試圖通過朝鮮的海外貿易關係與日本接觸，是以丁丑約條中亦詔諭朝鮮：「日本貿易，聽爾如舊，但當導其使者赴朝，朕亦將遣使至彼也。」¹¹⁵ 此處所謂的「日本貿易」，即朝鮮通過釜山倭館與日本對馬藩所進行的經貿往來，¹¹⁶ 可見清朝在建立之初曾試圖積極通過朝鮮導引日本使者前往瀋陽。¹¹⁷ 此現象與當時明朝對遼東實施的經濟封鎖有關。在此歷史背景下，十七世紀 30 年代滿洲人放眼東亞海域，試圖經由朝鮮半島取得日本物資，由此突破明朝的貿易制裁，是以丁丑之約清朝一方面強迫朝鮮中斷與明朝之聯繫，另一方面卻准許其繼續與日本維繫貿易，甚至鼓勵朝鮮接引日本使者前往遼東，以便與清朝建立直接聯繫。清朝欲通過釜山與對馬島間的貿易路線，進一步藉助朝鮮與日本建立貿易關係，實際上與十七世紀前期遼東對日本貨物之需求息息相關，而此現象須放置在十七世紀前期東北亞史及東亞海域史的脈絡中進行理解。

自 1618 年努爾哈齊起事以後，明朝試圖通過經濟制裁遏止女真在遼東的擴張。與中國傳統的朝貢交往中斷後，和朝鮮等地的邊境貿易遂成為金國主要的經貿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遼東自朝鮮輸入的貨物中有一部分實際上係朝鮮自日本轉手貿易而來，其中又以原產自東南亞的胡椒、蘇木（亦稱丹木）為大宗。這批

¹¹⁴ 李光濤，《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鈴木開，《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頁 387-442。

¹¹⁵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第 7 本，頁 611。《清實錄》重修本中曾略改其中字句，參：《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33，崇德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頁 431。

¹¹⁶ 田代和生，《日朝交易と対馬藩》（東京：創文社，2007）。

¹¹⁷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26。

胡椒、蘇木等香料主要原產於暹羅、占城、爪哇等國，自十六世紀前期至十七世紀 30 年代經由朝貢貿易、海外探險及民間走私等管道進入明代中國，¹¹⁸ 另一方面亦通過葡萄牙等南蠻商人銷往日本。¹¹⁹ 隨著 1607 年朝鮮與日本恢復邦交，重新開設豆毛浦倭館，日本方面開始由對馬藩定期將胡椒、蘇木運送至釜山。¹²⁰ 其後朝鮮復將這些購自釜山倭館的胡椒、蘇木，通過互市與餽贈等方式輸往遼東。¹²¹ 自 1627 年丁卯戰爭後金國強迫朝鮮重新開市，朝鮮頻繁將大量胡椒、蘇木輸往遼東，朝鮮進呈金國的禮品中，亦出現大量的胡椒、蘇木。根據朝鮮提供金國之禮單，天聰元年（1627）七月送丹木一百斤、胡椒八斗，同年九月又贈丹木一百斤、胡椒五斗；¹²² 天聰二年（1628）二、八月間，朝鮮又分別兩度贈送丹木一百斤、胡椒十斗。¹²³ 此類輸贈經年不絕。關於朝鮮所贈胡椒、蘇木來自日本一事，清朝亦有所悉，如崇德四年（1639）朝鮮國王致清廷國書中，曾描述乙亥（1635）以前日本每年定期前往釜山貿易的情況，稱：「許令每歲送船來致胡椒、丹木等物，本國因以土產計給。」¹²⁴

除朝鮮購自日本之胡椒、蘇木等香料外，遼東方面對於日本刀劍亦有強烈的興趣。自嘉靖倭亂以降，倭刀通過貢舶以及走私等管道，在十七世紀初期已成為流通於明代中國東南沿海的商品，並影響江南士人的習武之風。¹²⁵ 於此同時，女真人亦在十六世紀後期經由朝鮮半島獲取日本刀劍，進而形成搜集倭刀的需求。天聰元年（1627）丁卯戰爭結束後不久，朝鮮方面旋以「倭刀八柄」贈予金

¹¹⁸ T'ien Ju-kang, "Chêng Ho's Voyag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epper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 (1981): 186-197; 陳國棟，〈鄭和船隊下西洋的動機：蘇木、胡椒與長頸鹿〉，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增訂版）》（臺北：遠流，2013），頁 107-110；劉祥學、林枚，〈明代宮廷香料來源與消費述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 年 6 期：38-51；劉婷玉，〈從財政角度看明代胡椒及其海內外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2022 年 2 期：62-79。

¹¹⁹ 岡美穗子，《商人和宣教師：南蠻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0），頁 108-109。

¹²⁰ 田代和生，《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頁 40-41, 44-51。

¹²¹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頁 24-25。

¹²²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006。

¹²³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007, 0018。

¹²⁴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164；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353-354。

¹²⁵ 王鴻泰，〈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30.3（2012）：63-98。

國示好。¹²⁶ 此後遼東方面更是頻繁向朝鮮索取日本刀劍。天聰二年（1628）金國派遣宗室將領岳託（Yoto, 1599-1639，朝鮮史料作要土）前往朝鮮索要一種狀似漢地偃月刀的倭刀。根據岳託的描述，當時女真人應該是希望朝鮮能提供帶有長柄的日本薙刀（なぎなた，又名長刀），但由於語言以及認知差異，朝鮮方面最初將此物理解為「長劍」，並嘗試從日本刀中尋求近似品項。對於女真求取倭刀一事，朝鮮都承旨金尙憲（1570-1652）主張「倭刀異國之物，尤不可分外覓給」，然李倬為維持與金國關係，仍決定答應向女真人提供倭刀。¹²⁷ 然而當時朝鮮收藏的倭刀中，並沒有類似的物件，故《承政院日記》載：「彼之所求長劍，乃偃月刀形樣云，偃月刀則倭刀中，難以覓得。」¹²⁸ 最終朝鮮軍器寺按岳託的敘述打造狀似偃月刀的長柄倭刀，以應付金國需要。¹²⁹ 天聰六年（1632）金國又再次遣使向朝鮮索取「大倭劍十把、小倭劍十把」，¹³⁰ 所謂大倭劍當即日本武士刀中的太刀（たち）或打刀（うちがたな），至於小倭劍則為脇差（わきざし）。然朝鮮當時因對金國增索貢賦不滿，故李倬決定減少貢禮數量，並令其中大小倭劍各減少六把。¹³¹ 對於朝鮮國王下令驟減金國貢禮數額，邊備司官員有所顧慮，因此曾上書建議再行斟酌，李倬因而有所妥協，惟仍認為「其中倭劍，亦非所產，勿加其數」。¹³² 故翌年金國所收朝鮮寄到禮單中，大、小倭劍僅各得四把。¹³³ 天聰七年（1633）金國再度要求朝鮮增加貢禮中的倭刀數量，李倬以「倭刀非我國所產」為由拒絕。¹³⁴ 由此可見，雖然滿洲方面試圖通過朝鮮搜集日本刀劍，其數量及質量均相當有限，朝鮮方面甚至為應付其需求而自製所謂倭刀。

清朝對藉朝鮮交通日本一事，頗為看重，這與當時滿洲準備伐明入關的國策有關，故浦廉一強調當時滿洲人對日本方面的關注在於以武器為主的工藝品。¹³⁵

¹²⁶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15，仁祖五年二月十五日，頁 38。

¹²⁷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18，仁祖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頁 57。

¹²⁸ 《承政院日記》卷 21，崇禎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頁 106a。

¹²⁹ 《承政院日記》卷 21，崇禎六年五月二十七日，頁 106a。

¹³⁰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7，仁祖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頁 34。

¹³¹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7，仁祖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頁 34。

¹³²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7，仁祖十年十一月十九日，頁 34。

¹³³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054；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101。

¹³⁴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28，仁祖十一年三月十七日，頁 16。

¹³⁵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 145。

惟根據本文以上梳理，可知清朝試圖從朝鮮方面取得倭刀一事，實際成效相當有限，並未對清朝後來入主中原產生顯著影響。相較之下，遼東經由朝鮮得以從日本進口大量胡椒、蘇木等原產自東南亞的香料，無疑充實了清朝入關以前的經濟力量，為後來對明朝作戰提供物質基礎。從更加寬廣的全球史視野來說，滿洲經由朝鮮取得日本物資一事，與十七世紀前期葡萄牙等歐洲勢力在亞洲海域所經營的長途貿易息息相關。由是觀之，作為內亞征服王朝的滿洲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乃至入主中原，與大航海時代的跨域貿易可謂息息相關。這個背景也促成崇德二年清朝主動試圖通過朝鮮與日本建立直接聯繫。丁丑約條以後，朝鮮昭顯世子李湮及其弟鳳林大君李湜（1619-1659）依約於該年二月前往瀋陽為質，皇太極曾於通遠堡（今遼寧省丹東市鳳城市轄）設宴款待，酒過三巡後皇太極遂向昭顯世子垂詢朝鮮出使日本的情況，並重申朝鮮當迅速回報日本相關資訊，其謂：「爾國送使日本云，必送回答來，即馳通云。」¹³⁶ 清廷當時亟欲交通日本，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上述皇太極向昭顯世子打聽前往日本之朝鮮通信使，即丙子年（1636）出使江戶的任統（1579-1644）一行。¹³⁷ 崇德二年三月任統等人返歸朝鮮後，曾向李倧報告德川家光施政乃至幕府官舍軍備諸情。¹³⁸ 在接獲世子與任統分別傳回瀋陽及江戶之情報後，朝鮮君臣對於丁丑約條中協助清朝通信日本一事抱持消極態度，如吏曹判書崔鳴吉（1586-1647）等朝鮮大臣堅決反對此事，《朝鮮王朝實錄》載：

上曰：「彼有通信日本之言，何以爲答耶？」鳴吉曰：「此則決不可許也。」上曰：「彼欲必通於日本，則事極難處矣。」¹³⁹

朝鮮雖不願協助清廷通信日本，但亦不敢公開違背皇太極的旨意，故在右議政李聖求（1584-1644）的建議下，採取虛與委蛇的辦法。《承政院日記》載：

上曰：「日本通信一事，彼已丁寧言之，不可置之尋常，而其間事勢，多有難處，何以爲之？」聖求曰：「彼若問之，則通諭之意答之，何如？」上曰：「依爲之。」¹⁴⁰

¹³⁶ 趙慶男，《續雜錄》（收入氏著，《亂中雜錄》，冬），卷4，頁45。

¹³⁷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¹³⁸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34，仁祖十五年三月九日，頁36。

¹³⁹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34，仁祖十五年三月二十日，頁39。

¹⁴⁰ 《承政院日記》卷56，崇禎十年三月二十日，頁128a。

孔令偉

朝鮮當局遂將此一方針，傳達給身處瀋陽的昭顯世子。因此崇德二年九月清廷遣英俄爾岱（朝鮮史料作龍骨大）與馬福塔（Mafuta, 1594-1640，朝鮮史料作馬夫大）二人就丁丑約條中的日本通信事，詢問留駐瀋館之朝鮮官員時，並未獲得有效答覆，《瀋陽狀啟》載：

龍、馬又言：「日本使出來乎？我國欲為通信之意，曾於約條時言之矣。」臣等答曰：「日本海路甚遠，我國使臣十年一番往來，彼國則只商賈舡往來，使臣則近無出來之事矣。」龍、馬唯唯，別無它語為白乎矣，倭使若來，則欲使我國通於此處是白齊。¹⁴¹

朝鮮官員回覆清廷，宣稱日本隔海距離遙遠，近期並無日本使者前來，然而這種說辭與事實有所出入。正如浦廉一指出，朝鮮方面為維護自身外交利益，在向清朝呈遞日本情報時多有曲筆，從而傳遞片面甚至失真的資訊。¹⁴²

在提供不確資訊的同時，朝鮮對清朝要求接引日本使者前往遼東一事，更是諱莫如深。¹⁴³ 1637年朝鮮與清朝議和不久，日本方面曾聽聞此事，對馬藩旋派員出使朝鮮並於該年五月抵達釜山，對此朝鮮《邊例集要》稱：「差倭藤智繩伴從三名，以西賊討平致賀事，持書契出來。」¹⁴⁴ 可見日本方面在得知朝鮮與滿洲和談的情況下，曾以祝賀「西賊討平」為辭前往釜山；然而朝鮮方面當時不僅並未依照丁丑約條將日本使者引導至瀋陽，甚至未向清朝通報此事。約四個月後英俄爾岱、馬福塔打聽日本通信事時，瀋館朝鮮官員更是強調日本近期並未派使者前來。對於瀋館朝鮮官員的消極答覆，英俄爾岱、馬福塔並未提出質疑，當與其二人曾收受朝鮮賄賂有關，如丁丑下城後朝鮮國王曾以二人有「往來道達之恩，各餽銀二千兩」。¹⁴⁵

縱然朝鮮堅稱日本距離遙遠往來不易，但清廷並未放棄與日本通信的可能。崇德二年十月，清廷派遣英俄爾岱、馬福塔二人出使冊封朝鮮國王，¹⁴⁶ 同年十一月抵達漢陽。在冊封李倬的同時，清朝使團此行亦向朝鮮索取胡椒以及侍女入貢，並再度提及丁丑約條中的日本通信一案，為此朝鮮君臣曾有議論，當時負責

¹⁴¹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1。

¹⁴²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127-128。

¹⁴³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満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132。

¹⁴⁴ 《邊例集要》卷1，頁8b。

¹⁴⁵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9，崇德二年十月二十五日，頁509。

¹⁴⁶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39，崇德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頁510。

接待清朝使團的朝鮮遠接使李景曾（1595-1648）曾有相關報告，見於《承政院日記》：

景曾曰：「日本通信之說，出於索胡椒之日，臣言其事勢難通之狀，且言其國，邈在海中，決不可與相通。惟對馬島與我國海路稍近，而其地土瘠，禾穀不成，故此島之人，以丹木、胡椒、刀劍等物，一年一度來換米穀於我國云，則彼以為果然矣。」¹⁴⁷

通過搪塞外交辭令乃至賄賂清朝使者，朝鮮方面得以暫時應付清廷在丁丑約條中所提出的日本通信要求。在滿洲人屢屢追問日本情報的情況下，朝鮮內部亦出現向清朝傳達日本威脅論的情報，藉機強化自身軍備。如為避免清朝征調朝鮮戰船，大臣崔鳴吉曾建議國王李倧向清朝傳達「倭情異常」的日本威脅論，其稱：「清人日後若有請舟師之舉，則萬無搪塞之路。今若言倭情異常，故南邊有防備之事云，則雖有請船，庶有稱托之地。」¹⁴⁸ 李倧雖認同崔鳴吉的建議，但因顧慮引發清朝猜忌，一時並未答應執行。¹⁴⁹ 然而此情形隨著朝鮮、日本與清朝三邊關係的發展，最終在 1638 年發生變化。

如前所述，1637 年日本聽聞朝鮮與清朝和談的消息，對馬藩派遣藤智繩（亦名有田左兵衛）使團以「西賊討平致賀」為由前往釜山，在藤智繩一行探得丁丑下城朝鮮居於劣勢的實情後，日本方面復於 1638 年初遣使者平成連（亦名內野權兵衛）訪問朝鮮，就日朝外交關係提出七點要求，當中尤其質疑朝鮮輸往日本的明朝貨物減少，認為與丁丑以後朝鮮倒向清朝並同明朝中斷往來有關。對此日本問難朝鮮稱：「交易物貨，不如舊，唐路不通而然耶？因北狄之難耶？」¹⁵⁰ 由於日本來使措辭強硬，平成連所陳事又涉及外交禮儀之爭，朝鮮方面不願退讓，並懷疑日本將藉機舉兵入侵。朝鮮君臣議論此案時，曾就若日本來犯清朝是否將會出兵援助一事，展開討論。對於清朝軍援的可能性，兵曹判書李時白（1581-1660）消極地認為：「倭寇雖侵犯我國，清人之來救，未可必也。」¹⁵¹ 國王李倧則不以為然，認為朝鮮半島與遼東一衣帶水，故清軍必定來救，其曰：「我國為倭所有，則只隔一帶水，清國危矣。後患不可不慮，必盡力救之。王辰

¹⁴⁷ 《承政院日記》卷 62，崇禎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頁 31b。

¹⁴⁸ 《承政院日記》卷 60，崇禎十年九月十一日，頁 125b。

¹⁴⁹ 《承政院日記》卷 60，崇禎十年九月十一日，頁 125b。

¹⁵⁰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6，仁祖十六年一月二十二日，頁 8。

¹⁵¹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6，仁祖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頁 9。

孔令偉

之亂，天朝之來救，豈徒爲我國乎？其勢然也。」¹⁵² 由此可見，自丁丑年朝鮮成為清朝藩屬以後，李倬考量現實的國際局勢，在面臨日本威脅時試圖尋求清朝援助，而不再寄託明朝。在此背景下，李倬遂有主動向清朝呈報「倭情」之意，借以示警，對此領議政李弘胄（1562-1638）提出異議，認為：「清國自前欲與倭通貨，無乃仍此有通貨之意耶？是可慮也。」¹⁵³ 此處李弘胄再次提及清廷在丁丑約條後欲經朝鮮與日本通信乃至通商的意圖，擔心如報告倭情將再度引發滿洲人對日本的興趣。然而隨著朝鮮與日本外交關係日趨緊張，時任左議政崔鳴吉建請預先向清朝求援：「國家不幸，脫有南警，則請救之事，似當預言於清國也。」¹⁵⁴ 最終李倬認為當以文書形式將日本情報通告清朝，並且以「倭情異常」為由，在呈遞清朝的咨文中請求准許在漢水以南修築城池，至於請求援兵一事則無庸提起。¹⁵⁵

六・滿譯倭書：崇德年間朝鮮寄送清朝的倭情咨文

丁丑約條以後日本對朝鮮外交態度的轉變，促成 1638 年朝鮮一改過去對清朝要求交通日本的消極態度，轉為主動向清朝彙報。此後朝鮮開始頻繁向清朝彙報日本情報，因此清朝兵部在崇德三年至八年間（1638-1643）持續收到朝鮮國王寄來之倭情咨文。¹⁵⁶ 在前述背景下，清朝自崇德三年以後陸續經由朝鮮獲得關於日本之重大情報，其中之一即日本寬永十四年（1637）爆發的島原之亂，係由幕府彈壓天主教徒，加諸天災重稅等因素所導致的大規模百姓一揆（即農民民變）。日本國內發生民變的消息，亦經由駐紮釜山倭館的日本使者之口為朝鮮譯官所悉，隨後經由東萊府使鄭良弼（1593-1661）、邊備司洪喜男（1595-?）等人

¹⁵²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6，仁祖十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頁 9。

¹⁵³ 《承政院日記》卷 63，崇禎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頁 102a。《朝鮮王朝實錄》亦載李弘胄同日所言，字句有所修飾：「清人自前有欲與倭通貨之意，此不可不慮也。」《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6，仁祖十六年一月二十六日，頁 11。

¹⁵⁴ 《承政院日記》卷 63，崇禎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頁 154b。

¹⁵⁵ 《承政院日記》卷 63，崇禎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頁 154b。

¹⁵⁶ 文永奎，〈倭情咨文을 통해 본 仁祖・孝宗代の對外關係研究〉（春川：江原大學史學研究科博士論文，2005）；陳波，〈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情報搜集〉，頁 147-155；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頁 79-119；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頁 26-86。

輾轉呈報而為朝鮮中央得知，並旋即於崇德三年（1638）通報清廷。¹⁵⁷ 其後清朝方面亦要求朝鮮持續更新匯報島原之亂詳情。崇德三年朝鮮議政府左贊成洪燾（1585-1643）賁送清朝兵部的咨文中，便曾引述日本來使平成連等人之言，詳細描述島原之亂首領天草四郎（1621?-1638）的神異事跡，其謂：「聞有四郎稱名者為其魁首，年纔十六歲，有神術，能變幻。」¹⁵⁸ 此後清廷更是積極經由朝鮮打探日本情況，進而得知日本政局的重要變化。

崇德四年清廷派遣馬福塔前往朝鮮冊封李倧繼室趙氏為朝鮮國王妃，¹⁵⁹ 此行並欲征調朝鮮兵馬隨清軍攻打明朝。李倧設宴款待時，馬福塔曾預示清軍兵分北京、山海關二路攻打明朝的計畫，並要求朝鮮為進軍山海關提供海軍援助。¹⁶⁰ 馬福塔抵達漢陽後不久，曾聽聞日本使者將前來朝鮮的消息，當時漢陽城內謠傳日本使者將領兵千人同來，《承政院日記》稱：「今者倭差先來，適出於勅使到京之時，而近來都下別有一種訛言，至以差倭帶兵一千為言。」¹⁶¹ 在聽聞該消息後，馬福塔向李倧提出與日本使團會面的要求，其稱：「得聞倭使出來云，使吾儕相見，以開交隣之道」，¹⁶² 然李倧則以日本使者尚未抵達搪塞之。¹⁶³ 事後李倧召集大臣評估馬福塔的要求，認為：「其所言通倭一事，必非偶然。其意必欲交結，賈用兵器也。」¹⁶⁴ 由於當時清朝方面曾要求朝鮮輸送倭劍，¹⁶⁵ 朝鮮方面因此推斷清朝之所以欲積極交通日本，意在取得日本刀劍。

然在倭劍貿易之外，清朝對日本情報的關注，更是與當時東北亞的國際政治形勢密切相關。馬福塔最終未待日本使者抵達朝鮮，旋應期北返復命，然在抵達

¹⁵⁷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130, 0131, 0132；松浦章，〈清に通報された「島原の乱」の動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9（1986）：1-27。

¹⁵⁸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2-13。按：編者將這份咨文斷為崇德六年書，誤也；根據內容，當為崇德三年檔。

¹⁵⁹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47，崇德四年六月四日，頁 624-625。

¹⁶⁰ 《承政院日記》卷 69，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頁 128b-130a。

¹⁶¹ 《承政院日記》卷 69，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七日，頁 98a-b。

¹⁶² 《承政院日記》卷 69，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頁 146a。

¹⁶³ 《承政院日記》卷 69，崇禎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頁 146a。

¹⁶⁴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9，仁祖十七年七月一日，頁 1。

¹⁶⁵ 《承政院日記》卷 70，崇禎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頁 87b。又順治六年（1649）清朝遣使朝鮮詢問倭劍貿易情況，朝鮮回覆：「倭劍賈送，曾已有教，小邦非不盡力，而近來倭人切不許賈兵器，故今已十年，尚未賈得矣。」《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50，仁祖二十七年一月二十日，頁 2。

邊境的義州地界即將回歸遼東之際，其仍不忘留意日本方面消息，並向同行的朝鮮伴送使李景曾告稱：「聞倭差聽命於中原，將欲出來云。凡有消息，皆即通報瀋中。」¹⁶⁶ 根據馬福塔所言，可知當時滿洲人認為日本與明朝有所交通，並有暗中聯合朝鮮的隱患，而這種認知亦非空穴來風。如在此前明朝登萊總兵陳洪範（?-1646）便曾遣人前往義州傳遞票文，希望朝鮮可以聯合明軍共同打擊滿洲人。¹⁶⁷ 明朝方面又曾派員前往義州密報朝鮮士紳，宣稱崇禎「皇帝請兵於日本、琉球、安南、西洋等國，今將合勢討賊」。¹⁶⁸ 明朝、日本與朝鮮三者間的往來，再次挑起滿洲人對日本情報的關注。

除上述島原之亂及明、日關係之外，清廷亦曾經由朝鮮得知日本對馬藩的御家騷動事件，即所謂柳川一件。¹⁶⁹ 日本寬永八年（1631），對馬藩主宗義成與其家臣柳川調興，因領地以及海外貿易等經濟利益，雙方發生不合，柳川調興因而向幕府揭發其藩主長年篡改日本寄往朝鮮國書之內容。經過幾番辯論，幕府最終於寬永十二年（1635）判決宗義成無罪，並將柳川調興流放。此前曾代表對馬藩出使朝鮮的規伯玄方，也因此獲罪遭到流放。此即日本史上名為柳川一件的御家騷動事件。¹⁷⁰ 值得注意的是，明朝與清廷方面，曾先後分別通過朝鮮打探到關於柳川一件的相關情報。根據《內閣大庫檔案》中所藏兵部題行稿，崇禎八年（1635）明廷曾經由皮島守軍向朝鮮打聽日本人在對馬島的活動，從而得知「對馬島主平義成與其副將平調興有隙，勢不兩容，俱赴懇關白」。¹⁷¹

1635 年幕府判決將柳川調興及規伯玄方流放後，朝鮮方面終止其貿易額度。1639 年以後對馬藩主再次來使，試圖重新恢復並佔有過去調興、玄方二人的貿易額度。¹⁷² 在此背景下，朝鮮根據對馬藩主來書以及日本使者陳述，作成倭情咨

¹⁶⁶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9，仁祖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頁 8。

¹⁶⁷ 劉家駒，〈清初朝鮮潛通明朝始末〉，許倬雲等，《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127-128。

¹⁶⁸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36，仁祖十六年三月六日，頁 22。

¹⁶⁹ 程永超，〈朝鮮から明・清へ報告された柳川一件とその影響〉，木俣元一、近本謙介編，《宗教遺産テキスト学の創成》（東京：勉誠出版，2022），頁 195-221。

¹⁷⁰ 田代和生，《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徳川・朝鮮外交の舞台裏》（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頁 200；池内敏，〈「柳川一件」考〉，《歴史の理論と教育》152（2019）：19-42。

¹⁷¹ 〈兵部尚書張鳳翼題對馬島有倭深入其地事屬可駭奉有確偵馳奏之旨〉，崇禎八年九月，《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038117。

¹⁷² 《承政院日記》卷 70，崇禎十二年八月五日，頁 112b-113a。

文寄呈清廷，《朝鮮國來書簿》載崇德四年朝鮮國王遣使向清朝兵部提供之倭情咨文：

所謂大君者，乃日本國君之號；所謂調興者，乃島主副官之名；所謂玄方者，乃島主書記之名也。當初約和時，本國（按：即朝鮮）授兩人章服圖書，許令每歲送船，來致胡椒、丹木等物，本國因以土產計給。曾在乙亥（1635）年間，調興、玄方得罪國君，流配遠方，而島主猶望前給之物。本國以為兩人得罪遠謫，則仍舊送使，事涉無據，須待其代差出，方可許也，自此絕不復言。今忽訴於國君，有此來請之舉。¹⁷³

該咨文向清廷報告日本方面對柳川一件的處置，乃至其後日朝貿易的變化。與此同時，朝鮮方面亦附上對馬藩來書原文（圖 4），清朝方面將其理解為「日本國書」。¹⁷⁴ 這份以日本變體漢文書寫的外交文書，原件在當時被作為朝鮮咨文的附件寄往清廷，從而保留在《內閣大庫檔案》中，文稱：

〔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官平義成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維時，暑月鬱伊，台候若何？共惟〕本邦益固金湯，貴國彌安盤〔磐〕石，千里其致一也。先是乙亥載一件坦夷之後，所返獻之送使并以酹送使，貴國答書之情由，稟奏于東武執事，即今攀舊例，可圖議之，休命茲已受矣。自今更始，以須差使船，故姑先容，仍么麼土宜，具在別幅，伏冀采納，餘摠悉差使口布，為國順時自愛，惶恐不宣。寬永拾六己卯歲五月日。對馬州太守拾遺平義成。別錄：金屏風壹雙、茶臺子附諸具一箇、銀臺天目貳箇、提瓶貳箇、金紋紙貳百片。計。寬永拾六己卯歲五月日。¹⁷⁵

¹⁷³ 《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164；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353-354。《清實錄》亦收此咨文，惟除個別字句差異外，重修本避康熙帝諱，改日僧之名「玄方」為「元方」。《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48，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頁 645-646。

¹⁷⁴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48，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頁 645。

¹⁷⁵ 〈寬永十六己卯歲倭書〉，崇德四年，《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19829。原檔缺損處，據朝鮮《朝鮮國來書簿》、《同文彙考》及日本《方策新編》等史料抄文補錄：《朝鮮國來書簿》，微卷號 MC00870-00-00000-00000-0164；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353-354；《同文彙考》（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附編卷 12，頁 7；山田廉纂，《方策新編》（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第 5 冊，頁 1。關於此條史料先行研究已有漢字錄文、斷句，然與筆者理解頗有出入，請讀者自行參考：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編，《明清中國關係文書的比較研究：台灣所在史料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2021），頁 110-111。

孔令偉

信文內稱「乙亥載一件」，即寬永十二年之柳川一件事發。至於「所返獻之送使并以酓送使」，則分別指柳川調興以及規伯玄方。「稟奏於東武執事」，此指幕府老中。¹⁷⁶ 所謂「今攀舊例，可圖議之」，則體現日本希望比照柳川一件以前習慣，恢復過去對馬藩流芳院、以酓菴的歲遣船。¹⁷⁷ 朝鮮方面雖然因為與日本多有交涉，而能通曉這封書信的大意，然仍難以理解通篇變體漢文，故將此信轉呈清廷時稱「觀其書辭，文字僻澀，殆不可曉」。¹⁷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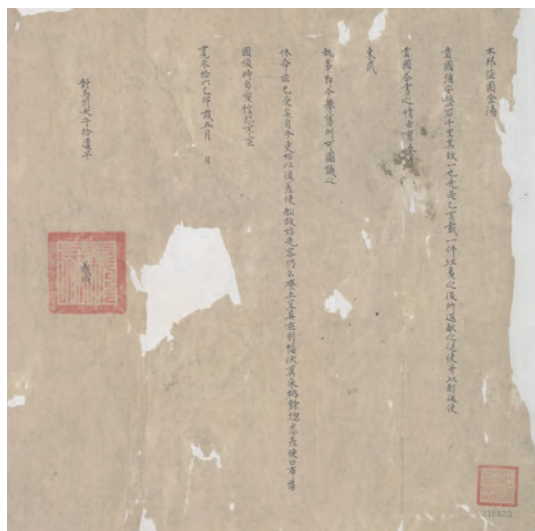


圖 4：〈寬永十六己卯歲倭書〉原件（局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2198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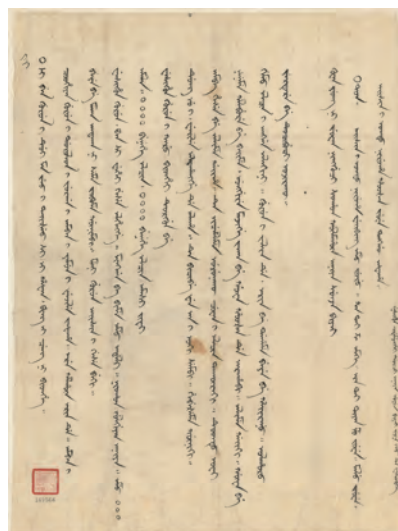


圖 5：〈寬永十六己卯歲倭書〉滿文譯本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67568）

¹⁷⁶ 荒木和憲指出「東武執事」即「幕府老中」，參：《明清中国関係文書の比較研究》，頁 110。按：關於日朝通信中「東武執事」指「幕府老中」的記載，《同文彙考》中有數例，如《同文彙考》附編卷 30 頁 18 載對馬藩主向朝鮮方面稱「東武執事徵我家士」，此類執事用例明顯指涉幕府老中，而非收文方的朝鮮。又本文書的「東武執事」，滿文明確譯作「東武的執事者」，詳下。

¹⁷⁷ 岩井茂樹，〈清朝、朝鮮、對馬——一六三九年前後東北亞細亞形勢〉，《명청사연구》20（2004）：87-102。

¹⁷⁸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 48，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頁 646。

這份來自對馬藩的書信被送往清廷後，旋被譯為滿文（圖 5），其後亦被保存在《內閣大庫檔案》中。譯文與原文內容有所出入，為資比較，將滿文內容直譯如下：

又，日本國對馬州太守拾遺官平義成書，奉書朝鮮國禮曹大人閣下：值此炎熱之際，大人身體未知如何，甚為掛念。本國堅固若金，貴國穩如磐石，地雖千里而如一。乙亥年一〇〇〇（按：漏譯對應「件坦夷」）後，〇〇〇〇（按：漏譯對應「所返獻之」）送使、〇〇〇〇（按：漏譯對應「并以酖」）送使歸來，已將貴國答書之情由，稟奏於東武執事。¹⁷⁹ 今欲從舊規，還望商議之，大令茲已拜收。自今新始，須差船使，故請以先前所納，所寄微物書於別紙，還望採納，其餘皆由使者之口相告。為國之故，順時自愛，惶恐不已。寬永拾六己卯歲五月日。計交金藥繪製圍屏一，茶臺子一，銀臺天目二，酒瓶二，金藥繪紙二百。崇德四年九月之十一日奏。¹⁸⁰

不同於過去滿洲人所熟稱的「倭子國」，日本在這份正式公文中被譯為「日本國」（*zi ben gurun*）。¹⁸¹ 然而由於對朝鮮、日本貿易制度以及相關背景認知有限，滿文譯本中對於「坦夷」、「返獻」以及「以酖」等三處無法理解之詞彙，

¹⁷⁹ 滿文譯作 *dung u i weile alihangge*，意即「東武的執事者」，足證清廷方面亦將此漢文「執事」理解為日本方面董其政者。

¹⁸⁰ 承志曾就這份滿文檔案進行轉寫以及漢譯，本文參考其成果進行修改重譯：承志，〈清前期滿文史料譯注六件〉，《古今論衡》7（2002）：81-102。滿文：“*jai zi ben gurun i dui ma jeo i taišo si i hafan, ping i ceng ni bithe. coohiyan gurun i dorolon i jurgan i amban i yamun i fejile jafaha. ere halhūn erin de. amban i beye be maka antaka ni seme jobome gūnimbi. meni gurun aisin i gese beki. wesihun gurun pan si wehei gese elhengge. minggan ba bime emu adali. niohon ulgiyan ainya. emu OOO amala. OOOO benehe elcin OOOO benehe elcin amasi jifi wesihun gurun i karu bithei turgun be dung u i weile alihangge de alaha. te bicibe fe an i oki sembi. hebešeme gūniki. amba hese be alime gaiha. te icemleme urunakū cuwan i elcin takūraki. tuttu ofi neneme halbure be baime. unggire majige jaka be guwa hoošan de arahabi. alime gaiki. gūwa be gemu elcin i angga alakini. gurun i jalin de, erin be dahame beye be hairanu. olhoru yertere be tucibuci ojirakū [ojorakū]. kuwan yung ni juwan ningguci sohon gūlmahun aniya sunja biyai ton. aisin i okto niruha weiping emu juru. tsai tai dzi emke. in tai tiyan mu juwe. malu juwe. aisin i okto niruha hoošan juwe tanggū afaha [jafaha]. wesihun erdemungge duici aniya uyun biyai juwan emu de wesimbuhe.*”〈日本國平義成與朝鮮國書〉，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67568。

¹⁸¹ 〈日本國平義成與朝鮮國書〉，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內閣大庫檔案》，登錄號 167568。

以畫圈代之。¹⁸² 此處所謂「坦夷」，即上述柳川一件事。至於「返獻」，即前往朝鮮之日本使者返國。而所謂的「以酏」，即規伯玄方駐錫之以酏庵（位於今長崎縣對馬市）。柳川一件事發後，寬永十二年幕府為強化經由對馬與朝鮮外交之控管，遂從京都五山中選僧一名，前往以酏庵輪番，為期二年。¹⁸³ 由於滿文譯者對日本、朝鮮外交制度的認知限制，未能充分理解以酏等詞義。這份日本國書的滿文縮譯，也成為清代官書的史源，從而影響後來清朝對日本的認知，如《清實錄》在收錄該信中關於柳川一件記載時，便根據滿文譯本潤飾為：「先是乙亥載，遣去使臣回時，以貴國答書之情由，稟奏於東武執事，即令攀舊例，可圖議之。」¹⁸⁴ 由此可見崇德朝滿文譯者對倭情咨文的理解，曾對清朝官修史書的編纂產生相當影響。

在諸如柳川一件等聚焦對馬藩的資訊外，朝鮮寄呈之倭情咨文亦向清廷提供江戶幕府相關情報。崇德七年二月對馬藩派遣使者平成幸（亦名三浦內藏丞）抵達釜山，經地方官員接洽後傳達來意，朝鮮國王李倧在得知情況後，遂咨文清朝兵部，其中詳錄平成幸等人向朝鮮口述日本資訊若干，其中首要者當為德川家光喜獲長男。對此該咨文譯錄平成幸所言：

大君年將四十，每以無嗣為憂，上年八月始生一男，名之曰若君，大小將官咸聚江戶致賀之際，大君言於島主曰：「吾以無功無德之人，承襲關伯三世于茲，年將四十，尚無一子，惟得罪先世是懼，幸而天佑神助，晚得此男，朝鮮聞之亦必喜悅矣。」有一執政言于島主曰：「此是日域大慶，朝鮮必有送使致賀之舉。」諸將官齊聲並應曰：「此言誠是。」仍著島主即為委通，故島主差俺出送。¹⁸⁵

以上日本使者所言，反映寬永十八年（1641）年近四十的德川家光喜獲長男，並在幕府「執政」的建議下通告朝鮮，望送來使慶賀。此處《朝鮮國王來書》提及日本「有一執政」，與前引寬永五年（1628）《交隣考略》所載「東都之執

¹⁸² 莊聲，〈清朝入關前文書體裁的演變〉，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237-256。

¹⁸³ 泉澄一，〈江戸時代、日朝外交の一側面—対馬以酏庵輪番制度と関係史料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0（1977）：23-44；池内敏，〈絶海の碩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

¹⁸⁴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48，崇德四年九月十一日，頁646。

¹⁸⁵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9），頁359；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472。

政」，名似同而實已異。¹⁸⁶ 寬永五年之執政乃任太政大臣之德川秀忠，惟寬永九年（1632）秀忠歿後太政大臣一職長期虛懸，此後「執政」一詞轉指代幕府老中。考察歷史脈絡，此處寬永十八年（1641）令對馬藩主通告朝鮮送使來賀，並獲幕府眾人附和之權臣，即當時大老土井利勝年邁中風靜養之故，因而實際統管幕政的老中首座松平信綱（1596-1662）。在此前後，松平信綱曾多次代表幕府，負責管理朝鮮與對馬藩事務，如寬永十三年（1636）信綱受幕府指派負責接待朝鮮送信使，¹⁸⁷ 正保三年（1646）更曾關心清朝入關後與朝鮮之關係。¹⁸⁸ 信綱亦曾就朝鮮通信使送迎議題，與對馬藩主宗義成等人書信往返。¹⁸⁹ 至於寬永十八年這位牽動當時日、朝關係的繃襪嬰兒，正是後來成為幕府第四代將軍的德川家綱（1641-1680）。

此外，平成幸又詳述日光山德川家廟擴建情形，並向朝鮮方面求取禮品：

且日光山有家康廟堂，而廟堂之後，新創社堂，樑柱四壁皆以玉石營造，其為華麗，萬古無比。有守僧二人，其一今年一百二十歲，即家康生時親信者也；其一即天皇之子也。上年冬，大君率諸將官親往焚香，後與諸將及兩僧會坐相賀，老僧言曰：「今為家康營建社堂，而家康為朝鮮殲滅秀吉，和好誠信，于今四十餘年。朝鮮若聞大君為家康至誠追遠之事，則必有相賀之禮，又有送物留跡之舉。令島主將此意報知朝鮮，請得國王殿下親筆一紙，及諸臣讚頌詩篇，以為萬代流傳之寶，至如大藏佛經，乃是寺刹極重之書；大鍾、香爐、燭臺、花瓶等器雖是我國易得之物，若得朝鮮所鑄，以為社堂傳玩之寶，則此亦朝鮮之功德。將此事意使島主轉達朝鮮如何？」諸將皆曰：「此意正好。」¹⁹⁰

日本使者此處所云日光山家康廟堂，即日光東照宮。寬永十一年至十三年間（1634-1636）在德川家光的主導下，日光東照宮曾進行大規模翻修，此即日本史

¹⁸⁶ 神宮司庁，《古事類苑・外交部》卷9，頁574。

¹⁸⁷ 姜在彥，《朝鮮通信使がみた日本》（東京：明石書店，2002），頁135。

¹⁸⁸ 孔令偉，〈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頁61。

¹⁸⁹ 松平信綱，〈老中松平信綱書狀〉，《對馬宗家文書》（福岡：九州國立博物館藏），箱2，P266。

¹⁹⁰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頁359-360；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472-473。

調「寬永大造替」，其後復於寬永十八年翻修東照宮本社山後之奧社。¹⁹¹ 東照宮翻修工程完畢後，德川家光曾率幕府群臣拜謁，當時有位住持神宮、年逾百歲的僧人建議幕府以家康滅豐臣氏為由，向朝鮮求取《大藏經》、銅鐘諸物。而日本使者口中這位曾為家康親信的高壽老僧，乃著名日本天台宗僧人天海（?-1643）。天海本人與德川家淵源深厚，根據日本天台宗史料《日光山列祖傳》記載，家光久未得嗣，天海曾於東照宮為之舉行祈子儀式。¹⁹² 故寬永十八年家光喜獲麟兒，曾對東照宮進行布施。天海平生於政教事業多有樹績，其中對《大藏經》的搜集與出版，尤為世所稱。¹⁹³ 結合以上資訊可以推斷，天海晚年曾希望藉由幕府對日光東照宮的重視，向朝鮮索請《大藏經》以助成其弘法心願。至於日本使臣提及日光東照宮中另一位僧人出身天皇后嗣，結合《日光座主御歷代》等日本史料之記載，可推斷此人即後水尾天皇第三子今宮（1634-1680），即後世所稱守澄入道親王，其於寬永十五年（1638）經天海奏請，以童稚之齡擔當日光山門主。¹⁹⁴

在日、朝關係之外，平成幸又提及「長崎漢船得聞清國消息」，¹⁹⁵ 並告知松平信綱為代表的幕府高層已知道朝鮮與清朝交好，其言：

上年冬，執政等問于島主曰：「近聞商販漢人之語，朝鮮與清國和好之事，島主何不報知於大君耶？」島主答稱：「朝鮮既與清國相好，此外別無他情」。執政但唯唯而已。¹⁹⁶

由此可知，前述 1637、1638 年分別由對馬藩派遣前往釜山的藤智繩及平成連使團，雖已得知朝鮮與清朝間之丁丑議和，但並未將實情即時稟告幕府。因此 1641

¹⁹¹ 別格官幣社東照宮社務所編，《東照宮史》（日光：東照宮社務所，1927），頁 46-48；田辺泰，《日光廟建築》（東京：彰國社，1946），頁 38-47；日光東照宮編，〈史料 寬永十三年 日光東照宮造営帳（一）〉，《大日光》12（1959）：33-36；日光東照宮編，〈史料 寬永十三年 日光東照宮造営帳（二）〉，《大日光》13（1959）：39-44。

¹⁹² 《日光山列祖傳》（收入天台宗典刊行會編，《天台宗全書》第 24 冊，東京：第一書房，1983），卷下，頁 475。

¹⁹³ 圭室文雄，《政界の導者：天海・崇伝》（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

¹⁹⁴ 《日光座主御歷代》（收入天台宗典刊行會編，《天台宗全書》第 24 冊，東京：第一書房，1983），頁 432。

¹⁹⁵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頁 359；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471。

¹⁹⁶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頁 360；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 473。

年幕府經由前往長崎之明朝商人得知朝鮮已投靠清朝的消息，遂有幕府老中質問對馬藩主朝鮮與清朝關係的實況。

崇德七年三月在收到以上朝鮮所寄之倭情咨文後，由於文化差異等因素，清廷對於咨文中有關日本的諸多內容產生疑問，曾數度派遣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1597-1666）、內國史院學士羅碩（Lošo, ?-1644）及英俄爾岱等官員前往瀋館數度詢問昭顯世子，從而進一步獲得日本文化乃至風土民情的相關資訊。¹⁹⁷《瀋陽狀啟》載：

范文程、盧施（羅碩）博氏兩人又到館所，申問倭國之俗，至於父子、君臣、上下之分，男女、衣服、飲食、性品、田土、物產、器用、居處如何之狀，無不歷問。世子隨所聞，一一答之。所問之言，煩冗重複，不敢盡達，而其意隱然在於要知國俗之美惡，兵力之強弱是白齊。¹⁹⁸

對於范文程與昭顯世子問答經過及內容，《瀋陽狀啟》有頗為生動之記載：

范文程先拈倭情咨文，手自點示，次令漢譯金貴仁讀之，多有尋問之事，如柵島、長崎、多大浦，問以何許地方為白去乙？世子教是答以某島屬某地是如為白齊。又問：「大君是何名，大君為一國之主乎？」世子答曰：「日本執一國之柄者，本稱關白，而頃年以來，改稱大君，大君之上有天皇，而於一國之事，無所與知。」文程又問：「然則天皇，無所為之事耶？」世子答曰：「天皇無所為，但事沐浴拜天，俗所謂倭皇帝也。」文程等相顧而笑。¹⁹⁹

根據兵部所收朝鮮來文，出身遼東的范文程通過朝鮮漢譯官與昭顯世子就日本情報一一進行問答。范文程首先詢問文書中提及之朝鮮與日本地名，除了朝鮮外海的柵島以及日本使團登陸的多大浦（今釜山西南）外，范文程亦得知明朝漢商前往貿易的日本口岸長崎。此後范文程亦向昭顯世子問及日本的政治制度，理解作為虛位元首的日本天皇以及掌握實權的幕府將軍二者關係。此後范文程復就朝鮮與日本間的人員交往、貿易規模乃至書信往返進行詢問：

又問：「藤智繩、崔義吉、洪喜男、李長生等是甚樣人？」世子答以某也倭差也，某某倭通事也。又問：「倭舡往來者幾何？且問書契者何也？」

¹⁹⁷ 浦廉一，〈明末清初的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頁132-135。

¹⁹⁸ 按：所謂博氏，即朝鮮漢字音譯滿蒙文學者頭銜 baksi，漢文史料亦音譯作榜式、把式。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28。

¹⁹⁹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30。

孔令偉

世子答曰：「兩國和好之後，稱以歲遣舡、特送舡，一年往來之舡，自我國定其常數，授以圖書，以時往來，有交相貿易之事。」又問島主何謂也？世子答曰：「乃是對馬島太守也，書契即對馬島主呈於禮曹判書之書也。」²⁰⁰

在打探完日本方面的背景資訊後，范文程就崇德七年倭情咨文的具體內容進一步追問：

又問：「家康者誰也？秀吉乃攻朝鮮者耶？」世子答曰：「家康即今關伯之祖也，平秀吉，即壬辰年作賊者也。」……又問：「所謂商販漢人者何也？」世子答曰：「曾聞中原南方商賈，相通於倭國云。」又問：「大藏經何等經也？」世子答曰：「諸佛經之總名也。」又問：「天皇之子，何以為僧？僧之所尊奉者，玉皇上帝耶？抑佛耶？」世子答曰：「倭國之俗，天皇長子為承襲，其餘子女，皆為僧尼，而其所尊奉者，乃佛也。」²⁰¹

圍繞倭情咨文中日本使者提及幕府藉翻修日光東照宮為由向朝鮮求取《大藏經》，乃至漢人商販向幕府通報清廷與朝鮮關係，范文程向昭顯世子打聽日本政治、經濟、宗教與文化等各面向。除了確認豐臣秀吉與德川家康等過往日本當權者事跡，明朝商人前往長崎貿易等政治經濟議題，范文程對日本的宗教信仰乃至天皇子嗣出家為僧等文化現象，皆感到好奇，故向昭顯世子詳細詢問。

不同於范文程直接根據朝鮮寄送之漢文咨文進行詢問，英俄爾岱等滿洲將領則根據咨文的滿文譯本與昭顯世子進行問答，《瀋陽狀啟》稱：「龍將等又令從人曉清書者，披讀倭情咨文翻譯之書，若相論難者然，其意專以漢商相通，及別無他情等項事為重。」²⁰²就資訊的理解過程而言，如同崇德四年滿文翻譯對馬藩文書時所遭遇的文化背景差異，英俄爾岱等人在閱讀滿文翻譯的倭情咨文時亦感到難以理解，然而通過昭顯世子的口頭解說，其對日本情報的疑惑得到進一步的釐清。相較范文程對於日本各類風俗的好奇，英俄爾岱則側重探尋倭情咨文中「漢商相通」與「別無他情」之語，前者即咨文所載日本與明朝商人在長崎通貨，後者則揭示日本經由對馬藩對清廷與朝鮮關係的刺探，明顯聚焦於日本對遼東與中國的情報偵蒐。

²⁰⁰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30。

²⁰¹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30。

²⁰²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瀋陽狀啟》，頁431。

值得注意的是，范文程、英俄爾岱等清廷大臣與昭顯世子就日本情報的問答，曾直接影響皇太極對日本的認識。范文程等人在與昭顯世子談話完畢後，曾對問答內容進行總結稟告皇太極，並附錄於兵部所收朝鮮咨文末尾：

然世子所言天皇子，即先日倭王子也，大君及關伯猶重地權臣，國柄皆在大君矣，故天皇無聞。又言天皇長子嗣位，其次皆為僧，世世如是。此不係客內語，出於世子口中之言，錄此以計後問，長汗阿馬說。²⁰³

此處所云「長汗阿馬」，當即皇太極本人。由此可見崇德七年三月朝鮮倭情咨文結合昭顯世子問答，為皇太極、英俄爾岱、范文程等清廷上層提供關於日本的政治、宗教、文化等各層面之多元資訊，尤其認識幕府將軍作為日本實際的掌權者，天皇乃虛位元首，天皇次子以下子嗣每每出家為僧。此外，皇太極本人對日本經由長崎貿易與漢商相通聲息，更是倍加留意。因此同年五月明將洪承疇（1593-1665）於松錦戰役後降清，皇太極曾派遣大學士剛林（Garin, ?-1651，朝鮮史料作加里）向洪承疇詢問中國南方與日本交通情形，《瀋館錄》載：

帝使博氏（此指剛林）問於承疇曰：「汝是南方之人云，日本人往來於南方耶？」洪答曰：「不為朝貢，豈有往來之事？」²⁰⁴

皇太極此問，顯然與英俄爾岱等人先前調查朝鮮咨文中，提及日本經由長崎貿易與「漢商相通」密切相關。在不理解皇太極此問的脈絡下，洪承疇以日本並未向明朝朝貢為詞，否定雙邊有往來關係。

崇德七年皇太極對日本情報的留意，一方面延續滿洲人長期以來對朝鮮「請兵於倭」的疑慮，另一方面則基於朝鮮的倭情咨文對明朝與日本的商旅往來及情資交流有所顧忌。在清廷積極擘畫用兵中原的背景下，皇太極對於日本與朝鮮的潛在影響曾進行評估，從而試圖求索壬辰倭亂的發生原因。同年七月，皇太極曾藉召見昭顯世子之機，詢問壬辰倭亂的原委乃至規模，《朝鮮王朝實錄》載：

皇帝使范文程等問曰：「壬辰年爾國王子為倭所擄，而得脫云，然耶？」世子答曰：「臨海、順和兩王子，被執於北道，而議和之後，許還矣。」……皇帝又問曰：「因漢人聞之，則爾國導倭共犯南朝，留置境上，而猶豫不發，故爾國替被兵禍云，然耶？兵釁何由而起乎？」世子答

²⁰³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頁360；張存武、葉泉宏，《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頁474。

²⁰⁴ 《瀋館錄》（收入金毓黻編，《遼海叢書》第8集，瀋陽：遼瀋書社，1985），卷3，頁2802。

孔令偉

曰：「寧有是理哉？日本關白平秀吉篡位之後，托謂假途於我國，為直犯南朝之計，我國終不許，遂被兵禍。故萬曆皇帝興師動衆，大破倭奴。漢人所謂導倭之說，實無據矣。」皇帝問曰：「壬辰年後，倭兵再犯朝鮮云，倭渡留爾國幾年？」世子答曰：「首尾六年，而丁酉之再犯也，一漢將大破倭兵於畿地，故倭衆遁去矣。」又問曰：「倭兵渡海之數七萬云，然耶？」世子答曰：「二十餘萬。」云矣，又問曰：「明朝怒和議之不成，責其主和之人，復出大兵云，然耶？」世子答曰：「其時果有此事矣。」²⁰⁵

由此可見，皇太極當時對於壬辰倭亂的具體經過，已有相當掌握，並且進一步藉當時漢人散播朝鮮曾「導倭」的傳言為詞，質問戰爭爆發的真實原因，是否因朝鮮援引日本武力而起，對此昭顯世子曾辯稱該說無據。

皇太極對壬辰倭亂的疑問，與其說是單純對歷史事實的知識探求，不如說是有著以史為鑒的現實關懷，同時意在警告朝鮮方面勿引日本兵力介入明清戰事。皇太極對於江戶幕府仿效壬辰舊事假道朝鮮攻打清朝的疑慮，實際上並非無稽之談。未待滿洲入主中原，皇太極已於 1643 年崩殂。1644 年清軍入關以後，擁立唐王朱聿鍵（1602-1646）的鄭芝龍（1604-1661）等南明勢力，曾數度遣使德川家光試圖乞師日本以助反清復明。²⁰⁶ 1646 年德川幕府內部曾有假道朝鮮伐清之議，甚至遣使向朝鮮當局透露此消息；惟順治朝滿洲一統中國後，對於朝鮮「請兵於倭」的疑慮逐漸淡化。²⁰⁷ 直到康熙朝復因海外情報搜集，日本情報再度成為清帝國對海洋世界的關注焦點。²⁰⁸

七・結論

十六世紀後期建州女真崛起的過程中，業已通過朝鮮半島多方留意日本之資訊。1592 年壬辰倭亂爆發不久，女真人即經由前往北京的貢使，自明朝方面得知日本進軍朝鮮半島的消息。努爾哈齊主動請纓參與朝鮮戰役的提議，雖然因朝鮮

²⁰⁵ 《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大王實錄》卷 43，仁祖二十年七月十六日，頁 16。

²⁰⁶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

²⁰⁷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頁 44-45。

²⁰⁸ 劉序楓，〈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故宮學術季刊》39.4（2022）：123-171。

的杯葛而遭到明朝擱置，卻開啟女真經由朝鮮認識日本的意向。在地理大發現的全球史背景下，日本得以吸收葡萄牙傳來之火器技術，通過壬辰倭亂遺留在朝鮮半島並被安插在圖們江邊界戍守的降倭，女真人開始留意日本鳥銃的先進火力。根據朝鮮戰役日本的部隊規模及火器科技等資訊，努爾哈齊本人將日本視為堪與明朝、蒙古、朝鮮並立的大國，從而著手對其展開情報搜集。待十七世紀前期金國以及清朝在關外先後建政，更曾通過朝鮮屢屢刺探日本政局，依次得知大坂之役、島原之亂、柳川一件等日本史上之重大事件，並且獲取日本計畫假道朝鮮半島西進遼東的情報，進而形成朝鮮請兵於倭乃至明朝鼓動日本的地緣政治認知。

另一方面，1619年薩爾滸戰役後東北亞地緣政治之巨變，促使十七世紀20年代日本通過對馬藩、長崎商人乃至漂流民等多元消息來源，持續關注女真人的對外擴張，先後聽聞金國於1621年攻掠遼陽及1627年丁卯戰爭入侵朝鮮等相關情報。出於對東北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興趣，江戶幕府內部數度出現聯合朝鮮攻打女真之議，最終在德川秀忠的授意下，1629年對馬藩使團幾經周折最終獲得朝鮮官方特許進入漢陽，向朝鮮國王李倬提出合勢討胡的提議。值得注意的是，幕府向朝鮮提出聯合軍攻打女真之說，與明朝官方在中國東南沿海與日本長崎間所經營的情報系統密切相關。由於朝鮮對日本的不信任，加上對馬藩暗中反對出兵的立場，明朝策動幕府所提出的合勢討胡之說，最終並未實現。

即便幕府並未真正出兵朝鮮半島，十七世紀30年代東北亞地緣政治的發展，尤其是攔截到明朝策動日本出兵之情報，乃至得知朝鮮內部的政爭傾軋，在在讓滿洲人對朝鮮請兵於倭的可能性產生顧慮，從而積極刺探日本方面的消息。1636年清朝建立至1644年入關前夕，在當時東亞海域貿易發展的背景下，滿洲人對日本倭劍乃至其轉手販賣之胡椒、蘇木等南洋香料的需求，為清朝伐明入關的戰略提供重要經濟基礎。在此歷史背景下，1637年清朝以武力迫使朝鮮簽訂丁丑約條時，明確要求朝鮮需協助日本通信一事。朝鮮最初對於清朝欲交通日本持消極態度，惟1638年日本得知清廷與朝鮮同盟一事後，對朝鮮的外交態度轉為強硬，促成朝鮮當局決定主動向清廷寄送倭情咨文，身處瀋陽的昭顯世子也在此背景下成為協助清朝破譯日本情報的重要資訊來源。從而使得清朝在入關以前便已認識江戶日本由天皇與幕府所構成的特殊政治制度，乃至明朝商人往來長崎與日本互通聲息之實況。值得注意的是，在入關以前滿洲統治者在未能深諳漢文的條件下，滿文翻譯成為清廷上層理解日本情報的重要資訊管道，因此在搜集、處理日本資訊的過程中，滿文文書與地圖曾發揮關鍵作用，諸如《滿文原檔》、《內國史院

孔令偉

檔》、《內閣大庫檔案》中的滿譯倭書，乃至〈兩儀玄覽圖〉圖中滿文對「倭子」（日本）以及「倭子海」（日本海）的標注，皆為實證。

綜上所論，自壬辰倭亂起迄清朝入關前，女真／滿洲人隨著與朝鮮及明朝關係的發展變化，開始密切關注日本相關資訊。十七世紀前期清朝在東北亞的崛起，與其對日本的認知有著緊密聯動，亦對其入關前後之海洋視野形成歷史基礎。另一方面，日本的滿洲認識亦與其對中國及朝鮮的外交政策息息相關，尤其以幕府藉合勢討胡名義，試圖介入朝鮮半島局勢的地緣政治企圖，最為顯著。至於朝鮮方面，則在滿洲與日本兩方之間的消息傳遞，發揮著中間地帶（middle ground）的作用，在促進二者間跨域資訊流通的同時，朝鮮根據自身外交利益對資訊的篩選，亦造成滿洲與日本雙方對彼此創造性的誤解（creative misunderstanding）。²⁰⁹ 與此同時，對馬島島民、漂流民、長崎商人乃至明朝間諜，均曾在滿洲、朝鮮與日本間的資訊流通，扮演著中間人的關鍵角色。以上各方勢力的錯綜經緯，共同交織出十六世紀後期至十七世紀前期歐亞大陸東部與東亞海域間的資訊整合及跨域交流，並為清朝入關以後中國、朝鮮與日本三方間的跨域交流，奠定歷史背景。²¹⁰

（本文於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十五日收稿；同年十二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的史料搜集與構想發軔，得益於 2018 至 2019 年間，先後赴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九州大學比較社會文化研究院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之學術經歷，期間獲得承志（Kicengge）、小林亮介、中砂明德、中島樂章諸位先生幫助，並承蒙日本臺灣交流協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獎（2018）、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日本研究獎（2018-2019）資助，謹致謝忱。

²⁰⁹ Richard White,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²¹⁰ 孔令偉，〈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頁 55-8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北洋海岸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554。
- 〈登津山寧四鎮海圖〉，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平圖 021455。
-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七年正月至六月》，小紅綾本初纂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文獻編號 103000147。
- 《大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編，《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
- 《內閣大庫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日光山列祖傳》，收入天台宗典刊行會編，《天台宗全書》第 24 冊，東京：第一書房，1983。
- 《日光座主御歷代》，收入天台宗典刊行會編，《天台宗全書》第 24 冊，東京：第一書房，1983。
- 《同文彙考》，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 《承政院日記》，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 《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 《東萊府接倭狀啓謄錄可考事目錄抄冊》，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 《清三朝實錄採要》，日本寬政九年江戶伍石書軒刊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 《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朝鮮王朝實錄》，漢城：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1958。
- 《朝鮮物語附柳川始末、朝鮮風俗》，福岡：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 《朝鮮國王來書（崇德七、八年分）》，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9。
- 《朝鮮國來書簿》，縮微膠卷，漢城：漢城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 《滿洲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 《瀋陽日記》，收入內藤虎次郎編，《滿蒙叢書》第 9 卷，東京：滿蒙叢書刊行會，1921。
- 《瀋館錄》，收入金毓黻編，《遼海叢書》第 8 集，瀋陽：遼瀋書社，1985。
- 《邊例集要》，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 山田廉纂，《方策新編》，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明清史料甲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

孔令偉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明清檔案卷（清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天聰朝、崇德朝》，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6。
- 日光東照宮編，〈史料 寬永十三年 日光東照宮造宮帳（一）〉，《大日光》12（1959）：33-36。
- 日光東照宮編，〈史料 寬永十三年 日光東照宮造宮帳（二）〉，《大日光》13（1959）：39-44。
- 田代和生、米谷均、金文京、吉田光男編，《方長老上京日史・飲冰行記》，東京：ゆまに書房，2021。
- 田代和生編，《御上京之時每日記》，東京：ゆまに書房，2023。
- 申忠一，《建州聞見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8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 任統，《任參判丙子日本日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朝鮮通信使文獻選編》第2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
- 宋濂等纂，《元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 李健，《葵窓遺稿》，首爾：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編，《瀋陽狀啟》，京城：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5。
- 松平信綱，〈老中松平信綱書狀〉，《對馬宗家文書》，福岡：九州國立博物館藏，箱2，P266。
- 松浦允任，《朝鮮通交大紀》，東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 茅瑞徵，《東夷考畧》，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第1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 徐恆晉校釋，《建州紀程圖記校注・漢譯《韃靼漂流記》》，瀋陽：遼寧大學歷史系，1979。
-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清許涵度刻本影印。
- 班固撰，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6。
- 神田信夫等編，《內國史院檔・天聰七年》，東京：東洋文庫，2003。
- 神宮司序編，《古事類苑・外交部》，東京：神宮司序，1903。
- 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一六一九—一六四三》，臺北：國史館，2000。
- 曹婉如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 脫脫等纂，《金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 魚叔權，《攷事撮要》，朝鮮仁祖年間刊本，首爾：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
-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
- 黃道周，《博物典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 董其昌，《神廟留中奏疏彙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注，《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3。
- 趙慶男，《續雜錄》，收入氏著，《亂中雜錄》，漢城：趙台熙，1964。
- 廣祿、李學智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
- 鄭麟趾等纂，《高麗史》，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藏。
- 羅貫中編著，毛宗崗批評，饒彬校訂，《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89。

二・近人論著

孔令偉

- 2024 〈從滿文媒介看清朝資訊在江戶日本之流通〉，《成大歷史學報》66：55-81。

木村可奈子著，夏歡譯

- 2024 〈日本入侵琉球後明朝對日的警戒〉，《成大歷史學報》66：223-257。

王鴻泰

- 2012 〈倭刀與俠士——明代倭亂衝擊下江南士人的武俠風尚〉，《漢學研究》30.3：63-98。

仲光亮

- 2017 《日本江戶幕府搜集中國情報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吳政緯

- 2019 〈「朝鮮」如何進入明清史家的視界〉，《明代研究》33：155-198。

李丹

- 2018 〈明末清初朝鮮移民金氏新達理家族研究〉，《中州學刊》2018 年 5 期：134-138。

李光濤

- 1948a 〈清太宗求款始末提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25-128。
- 1948b 〈記奴兒哈赤之倡亂及薩爾滸之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2：173-191。

孔令偉

1971 〈記漢化的韓人〉，氏著，《明清史論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下冊，頁 639-652。

1972a 《記明季朝鮮之「丁卯虜禍」與「丙子虜禍」》，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72b 《朝鮮「壬辰倭禍」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孟衡

2015a 〈從朝鮮、滿洲間的逃人刷還問題看十七世紀東北亞國際秩序變遷〉，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5b 〈在主體性與他律性之間：戰後韓國學界的十七世紀朝鮮對外關係史研究特徵與論爭〉，《臺大東亞文化研究》3：61-100。

沈玉慧

2023 〈十七世紀朝鮮交鄰政策之轉變——以對日、後金往來文書為例〉，《漢學研究》41.2：81-130。

孟森

2000 〈清太祖由明封龍虎將軍考〉，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正續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岩井茂樹

2004 〈清朝、朝鮮、對馬——一六三九年前後東北亞細亞形勢〉，《명청사연구》20：87-102。

承志

2002 〈清前期滿文史料譯注六件〉，《古今論衡》7：81-102。

2009 《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国の形成と八旗社会》，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1 〈尼布楚條約界碑圖的幻影——滿文《黑龍江流域圖》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9.1：147-236。

林志宏

2015 〈殖民知識的生產與再建構——「滿洲國」時期的古物調查工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7：1-50。

徐光台

2012 〈利瑪竇、李應試與《兩儀玄覽圖》〉，《漢學研究》30.4：133-167。

徐凱

2000 〈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 年 5 期：62-73。

- 2009 〈八旗滿洲高麗家族與清初戰爭〉，《明清論叢》第9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129-140。
- 崔雄權、褚大慶
- 2011 〈韓國古典漢文小說〈姜虜傳〉的文本結構及其文化意蘊〉，《外國文學研究》2011年1期：118-127。
- 張存武
- 1987 《清代中韓關係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張存武著，吳政緯編校
- 2021 《清代中韓關係史論集（卷一）》，臺北：秀威資訊科技。
- 莊聲
- 2016 《帝国を創った言語政策：ダイチン・グルン初期の言語生活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 2018 〈清朝入關前文書體裁的演變〉，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237-256。
- 陳波
- 2014 〈清朝與日本之間的情報搜集——以清朝入關前後為中心〉，《江海學刊》2014年4期：147-155。
- 2017 〈明清交替之際中朝日三國的外交關係與文人交流——聚焦明清鼎革期間東亞國際政治與文化的諸相〉，한일관계사학회（韓日關係史學會）編，《한일수교 50 년, 상호이해와협력을위한역사적재검토（韓日建交 50 年——相互理解和協力的歷史再檢討）》，首爾：景仁文化社，第2卷，頁145-236。
- 陳國棟
- 2009 〈馬尼拉大屠殺與李旦出走日本的一個推測（1603-1607）〉，《臺灣文獻》60.3：33-62。
- 2013 《東亞海域一千年（增訂版）》，臺北：遠流。
- 陳慈玉
- 2003 〈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45。
- 黃一農
- 2002 〈劉興治兄弟與明季東江海上防線的崩潰〉，《漢學研究》20.1：131-161。
- 黃彰健
- 1967 〈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下：459-473。

孔令偉

葉高樹

- 2009 〈明清之際遼東的軍事家族——李、毛、祖三家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2：121-196。

游逸飛

- 2012 〈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史原》復刊3：197-212。

廖敏淑

- 2015 〈清代中、朝、日邊境貿易——以柵門及倭館貿易為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3期：126-137。

劉序楓

- 1988 〈清代前期の福建商人と長崎貿易〉，《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16：133-161。
- 1999 〈明末清初的中日貿易與日本華僑社會〉，《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3：435-473。
- 2022 〈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為線索〉，《故宮學術季刊》39.4：123-171。

劉家駒

- 1994 〈清初朝鮮潛通明朝始末〉，許倬雲等，《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頁121-162。

劉浦江

- 2008 〈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氏著，《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頁235-273。

劉祥學、林枚

- 2017 〈明代宮廷香料來源與消費述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7年6期：38-51。

劉婷玉

- 2022 〈從財政角度看明代胡椒及其海內外貿易〉，《中國經濟史研究》2022年2期：62-79。

蔡長廷

- 2016 〈日本對北亞史的研究歷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

鄭潔西

- 2014 〈萬曆四十七年投書日本德川幕府的「浙直總兵」考〉，《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年4期：37-45。

遼寧省檔案館譯編

- 1984 《三姓副都統衙門滿文檔案譯編》，瀋陽：遼瀋書社。

薛明

- 2012 〈日本學界關於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3期：30-37。

- 2014 《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羅麗馨

- 2009 〈江戸時代朝鮮通信使對日本的觀察——以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為中心〉，黃應貴主編，《空間與文化場域：空間之意象、實踐與社會的生產》，臺北：漢學研究中心，頁135-196。

三田村泰助

- 1965 《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会。

大庭脩

- 1967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學術研究所。

- 1980 《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

- 2001 《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東京：岩波書店。

中村和之

- 2006 〈金・元・明朝の北東アジア政策と日本列島〉，天野哲也、臼杵勲、菊池俊彦編，《北方世界の交流と変容：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日本列島》，東京：山川出版社，頁100-121。

中村栄孝

- 1969 《日鮮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中島樂章

- 2011 〈14-16世紀、東アジア貿易秩序の変容と再編—朝貢体制から1570年システムへ—〉，《社会経済史学》76.4：3-26。

- 2013 〈一五四〇年代の東アジア海域と西欧式火器：朝鮮・双嶼・薩摩〉，氏編，《南蛮・紅毛・唐人：一六・一七世紀の東アジア海域》，京都：思文閣出版，頁99-176。

中澤寛将

- 2019 〈ロシア沿海地方の女真遺跡〉，古松崇志等編，《金・女真の歴史とユーラシア東方》，東京：勉誠出版，頁234-240。

井上直樹

- 2013 《帝国日本と満鮮史：大陸政策と朝鮮・満州認識》，東京：塙書房。

孔令偉

井黒忍

- 2021 〈女真の形成——東北アジアにおける諸集団の興亡〉，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編，《金（女真）と宋：12 世紀ユーラシア東方の民族・軍事・外交》，東京：研文出版，頁 109-169。

今西春秋譯

- 1936 《満和對譯満洲實録》，京都：東洋史研究会。

内藤湖南

- 1970 〈清朝開國期の史料〉，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編，《内藤湖南全集（第七卷）》，東京：筑摩書房，頁 321-344。

夫馬進

- 2015 《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木村可奈子

- 2024 《東アジア多国間関係史の研究：十六—十八世紀の国際関係》，京都：思文閣出版。

永積洋子

- 1987 《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1637-1833 年》，東京：創文社。

田中克己

- 1959 〈清鮮間の兀良哈（ワルカ）問題〉，《史苑》20.2：28-41。

田代和生

- 1980 〈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対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一）〉，《朝鮮学報》96：85-94。
1981a 〈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対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二）〉，《朝鮮学報》98：63-76。
1981b 〈寛永六年（仁祖七、一六二九）、対馬使節の朝鮮国『御上京之時毎日記』とその背景（三）〉，《朝鮮学報》101：51-108。
1981c 《近世日朝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
1983 《書き替えられた国書：徳川・朝鮮外交の舞台裏》，東京：中央公論社。
2007 《日朝交易と対馬藩》，東京：創文社。

田辺泰

- 1946 《日光廟建築》，東京：彰国社。

白鳥庫吉

- 1971 〈満鮮史研究の三十年〉，《白鳥庫吉全集》，東京：岩波書店，第 10 卷，頁 403-407。

- 石原道博
1945 《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
- 仲尾宏
2000 《朝鮮通信使と壬辰倭乱：日朝關係史論》，東京：明石書店。
- 圭室文雄
2004 《政界の導者：天海・崇伝》，東京：吉川弘文館。
- 宇田川武久
1993 《東アジア兵器交流史の研究：十五～十七世紀における兵器の受容と伝播》，東京：吉川弘文館。
- 池上二良
1968 〈カラフトのナヨロ文書の満州文〉，《北方文化研究》3：179-196。
- 池内宏
1934 《刀伊の入寇及び元寇》，東京：岩波書店。
1972 《満鮮史研究・近世篇》，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 池内敏
2017 《絶海の碩学：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9 〈「柳川一件」考〉，《歴史の理論と教育》152：19-42。
- 米谷均
2000 〈一七世紀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武器輸出〉，藤田覚編，《十七世紀の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39-67。
2001 〈近世前期日朝關係における「図書」の使用実態〉，《史観》144：1-15。
- 別格官幣社東照宮社務所編
1927 《東照宮史》，日光：東照宮社務所。
- 村井章介
2016 〈鉄砲伝来と倭寇勢力：宇田川武久氏との討論〉，《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201：81-96。
- 谷本晃久
2020 《近世蝦夷地在地社会の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
- 河内良弘
1992 《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朋舎出版。
- 和田清
1955 《東亞史研究・満洲篇》，東京：東洋文庫。

孔令偉

岡美穂子

2010 《商人と宣教師：南蛮貿易の世界》，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東方学会編

2000 《東方学回想》，東京：刀水書房。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

2021 《明清中国関係文書の比較研究：台湾所在史料を中心に》，東京：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

松浦茂

2006 《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松浦章

1986 〈清に通報された「島原の乱」の動静〉，《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9：1-27。

2003 《清代中国琉球貿易史の研究》，宜野湾：榕樹書林。

2005 《近代日本中国台湾航路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

2007 《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出版。

2009 《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出版。

泉澄一

1977 〈江戸時代、日朝外交の一側面—対馬以酓庵輪番制度と関係史料について—〉，《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10：23-44。

相田二郎

1958 《蒙古襲来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姜在彦

2002 《朝鮮通信使がみた日本》，東京：明石書店。

浦廉一

1934a 〈明末清初の鮮満関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史林》19.2：24-48。

1934b 〈明末清初の鮮満関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二）〉，《史林》19.3：122-146。

荒野泰典

1988 《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笠谷和比古、黒田慶一

2000 《秀吉の野望と誤算：文禄・慶長の役と関ヶ原合戦》，東京：文英堂。

程永超

2021 《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大阪：清文堂出版。

2022 〈朝鮮から明・清へ報告された柳川一件とその影響〉，木俣元一、近本謙介編，《宗教遺産テキスト学の創成》，東京：勉誠出版，頁 195-221。

園田一亀

1948 《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東京：国立書院。

1953 《明代建州女直史研究・續篇》，東京：東洋文庫。

鈴木信昭

2008 〈利瑪竇『兩儀玄覽図』攷〉，《朝鮮學報》206：21-60。

鈴木開

2021 《明清交替と朝鮮外交》，東京：刀水書房。

蓑島栄紀

2006 〈史料からみた靺鞨・渤海・女真と日本列島〉，天野哲也、臼杵勲、菊池俊彦編，《北方世界の交流と変容：中世の北東アジアと日本列島》，東京：山川出版社，頁 76-99。

関幸彦

2021 《刀伊の入寇：平安時代、最大の対外危機》，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稲葉岩吉

1914 《清朝全史》，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

1921 《朝鮮文化史研究》，東京：雄山閣。

1922 〈満鮮不可分の史的考察〉，《東洋》25.5：25-33。

1933 《光海君時代の満鮮關係》，京城府：大阪屋號書店。

구범진 (丘凡真)

2013 《조선시대외교문서 : 명.청과주고받은문서의구조분석》，서울시：한국고전번역원。

신해진、정지용

2006 〈東事雜錄本〈姜虜傳〉해제및역주〉，《어문논총》17：117-206。

文永奎

2005 〈倭情咨文을통해본仁祖・孝宗代の對外關係研究〉，春川：江原大學史學研究科博士論文。

孔令偉

Morar, Florin-Stefan

- 2018 “Relocating the Qing i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cience: The Manchu Translation of the 1603 World Map by Li Yingshi and Matteo Ricci.” *ISIS* 109.4: 673-694.

Song, Nianshen (宋念申)

- 2018 *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öderblom Saarela, Mårten (馬騰)

- 2020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A Script and Its Study in East Asia and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T'ien, Ju-kang

- 1981 “Chêng Ho’s Voyag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epper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 186-197.

Toby, Ronald P.

- 1991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Asi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kugawa Bakufu*.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Vitale, Judith

- 2024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Mongol Invasions in Jap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Wang, Yuanchong (王元崇)

- 2018 *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9*.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hite, Richard

- 2011 *The Middle Ground: Indians, Empires, and Republics in the Great Lakes Region, 1650-18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formation Circulation between Manchuria, Korea, and Japan before the Qing Conquest of China

Ling-Wei K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rise of the Jianzhou Jurchens (later known as the Manchus) in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isin Gurun (Later Jin dynasty) by Nurgaci (1559–1626) in 1616, the authorities of Manchuria had already gained some knowledge of Japan. Around the time of the Imjin War in 1592, the Jurchens had obtained information from Choson Korea and Ming China, and engaged in corresponding foreign activities,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the gunpowder technology that Japan had acquired from Europe. Aisin Gurun, after winning the Battle of Sarhu in 1619, obtained further knowledge from the surrenders of Korean parties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following the Siege of Osaka and becam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for Japanes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the Tiancong era (1627–1636) of the reign of Hong Taiji (1592–1643), because of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nvolving Manchuria, Korea, and Ming China, the Manchus actively collected intelligence on a potential military alliance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okugawa shogunate and the Ming dynasty, thereby labeling Japanese-relat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in Manchu script on maps. As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ts regime outside of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Chongde era (1636–1643), the pursuit of information on Japan grew increasingly frequent. After Korea became a vassal state of the Qing following the Treaty of 1637, Hong Taiji repeatedly sent envoys to order Korea to guide Japanese envoys from Tsushima Island to Mukden through Busan in hopes of establishing trade relations with Japan to obtain Japanese swords and Southeast Asian spices, breaking the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Ming dynasty on Manchuria. Korea was initially passive towards the Qing's request to communicate with Japan; however, the deterior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Japan in 1638 prompted the former to actively comply with the Qing court. Under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the information on Japan was translated into Manchu and interpreted by Crown Prince Sohyeon of Korea, who remained in Mukden as a hostage. The Qing

孔令偉

was accordingly able to procure intelligence on significant events in Edo Japan, including the Shimabara Rebellion and the Yanagawa Incident,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More broadly, the Qing dynasty extensively gathered information on various aspects of Japanese politics, society, economics, and culture, particularly focusing 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emperor and the shogunate, as well as trade between the Ming and Japan through Nagasaki. These divers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had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Manchus' understanding of Japan before they entered China proper, one which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Qing expansion in Northeast Asia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mpire's later maritime awareness.

Keywords: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Ming-Qing China; Edo Japan; Choson Korea; information circulation